

【论 文】

民族与国民在边疆： 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¹

王明珂²

民族与国民这两个词汇及其所蕴含的概念，对于当代中国及中国人认同有无比的重要性。如今在中国，每一有中国国籍之人皆为其“国民”，且都有其“民族”归属，两种身份所涉之权利义务都受种种制度、法令之规范与保障。目前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国民”与“民族”这两个词虽早见于中国古籍文献，但它们得到其现代内涵，并在政治、社会层面造成深远影响，却为晚清民初之时代变迁所造成。这个时代变迁，也就是在欧美殖民主义国家全球性资源争夺、扩张之阴影下，中国知识分子慑于其所挟之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救亡图存而将中国打造为一民族与民主国家之过程；此变化过程，其内涵包括言论呼吁、革命行动、思想教育、制度建立等等，由清末绵延至 20 世纪 50-70 年代之民族识别与民主改革而大致底定。

然而这并非是说从此不再有变化。在中国，时至今日每个人以“国民”（或中国人）与某“民族”（通常指的是少数民族）身份所发之言行，或涉及这些身份的事件，皆不断地塑造及改变“国民”与“民族”之定义。“国民”与“民族”之概念及其具体实践是因时变易的，在世界所有国家皆然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日讨论“国民”与“民族”等概念，在中国，由引入、萌生、传布到化为政治社会现实之历史过程，不仅是学术性、历史性探讨，也是期望能通过对“过去”的认识与反思中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代现实。

关于“国民”与“民族”等概念如何传入中国，特别是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关于此之言论，如何透过报章媒体在知识分子间流传，近代史学者们已有很多丰富而精湛的研究成果⁴。因而本文只引用而不再重复这些研究讨论。这篇文章探讨一个近代史学者们较少触及的议题：在民国肇造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学者们如何挟其“国民”与“民族”概念与身份，来从事边疆人群及其文化考察，并经由与地方人士的亲近接触，将这些概念传播到近代中国边疆人群社会之中。当时中国边疆的本土知识分子如何回应外界传来之“民国”、“国民”与“民族”等新知，以及他们如何藉此得到相关的身份认同（民族与国民）。对此议题我多作一些说明。

清末民初许多学贯中西的政治思想家如梁启超、严复等人，的确在以民主政治启迪民智上有很大的贡献。然而，深受其思想、言论及行动影响的社群，主要仍为居于中国政治空间核心及社

¹ 本文为作者在 2019 年 4 月 1 日北京大学“第七届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旨演讲，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1 期。

² 作者为中研院（台北）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

³ 如当代有些学者开始注意，由于网络跨国沟通之便利，以及跨国经济、资产、文化与人力流动之频繁，以及跨国经济体之建立，在全球许多地方“国民”认同都开始发生改变。相关研究见 Damian Tambini, “Post-national Citizenship,” i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4, No. 2 (2001): 195-217; Antje Weiner, “Making sense of the new geography of citizenship: fragmented citizen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6, No. 4 (1997): 529-560.

⁴ 相关研究如：沈松桥，《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4分（2002）：685-734；郭忠华，《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citizen, citizenship汉译为中心的论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6期，第73-156页。Joshua A. Fogel and Peter Zarrow ed. *Imagining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1890-1920*. Armonk: M. E. Sharpe, 1997; Peter Harris, “the Origins of Modern Citizenship in China,”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43. No. 2 (2002): 181-203; 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21世纪双月刊》2003年6月，第73-83页。

会上层之主流知识分子。对于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居于社会底层及中国边疆的民众，在民国建立后的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他们仍在学习、摸索与认识“民族”及“国民”等概念，也在学习及接受自身成为“中华民族”或某“少数民族”成员以及中国“国民”的过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年从事边疆民族考察的学者们扮演了十分微妙的角色。他们的学术专业被认为具有认识及分辨“民族”的能力；事实上，此时他们从事的主要工作也便是厘清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以及划分各“民族”间的边界。他们深入研究对象人群中的研究方法，所谓田野考察，使得他们必须亲身与边疆人群接触，以考察其社会文化。于是在与边疆本土知识分子的接触中，民族考察者本身成为民族知识的传播者；被考察的本土知识分子，在习得民族知识后则成为本“民族”之建构者。另外，成长及生活在国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些民族考察者也带着其“国民”认同来到边疆，观察这儿的“边民”，边疆国民，或“边胞”，边疆国族同胞。我们可以从他们与本地人的微观互动，从他们留下的书写文本中，了解当时来自国族核心的“国民”——国民概念在个人身上的体现（embodiment）——如何看待国族边缘的“国民”，以及其言行与文字书写之时代意义¹。在本文中，我主要以两位“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者的田野考察，两个在“民族”与“国民”方面各有偏重的考察为例，说明这个微观的社会互动与历史变迁过程。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民族学者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该所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人文学术机构²，更因它的组织架构及相关学术生产皆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密不可分³。

在这样的微观人际互动研究中，我们需要依赖特别的史料文本，以发掘及重建当时民族考察者在“田野”中的所言、所为、所想，以及其与他人之互动。一般来说，这些讯息都不会出现在其考察成果“民族志”（ethnographic monograph）书写内容之中，而经常是“田野日志”（ethnographic field notes）的主要内容。然而不是所有民族学、人类学者都有写田野日志的习惯，田野日志亦无一定的书写格式，且多杂乱无序。因此，写成的田野日志很少被出版流传，已出版的此类作品其学术意义也常被忽略⁴。作为本文主要研究对象的两位学者，于1929到川西岷江上游考察当地“羌民”、“西番”与“獐狲子”等人群的黎光明，以及1942-1943年至川南叙永进行“川苗”考察的芮逸夫，都留有杂记及田野日志之类的记录⁵，因此我们可以据以了解他们在

¹ 由于数字数据库在大笔数据处理上的便利，学者们在关于中国早期“民族”、“国民”等概念之研究中常利用数据库之词汇搜寻功能，来探索这些概念在中国的产生、流布与转变。这样的新研究工具的确产生许多很好的研究成果。本文希望从另一角度、另些材料来探索此问题。此也就是，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国民”等概念已具体化入于部份知识分子的个人认同之中。这样的个人，其一言一行都是我们探索那时代“民族”、“国民”概念与认同实践的材料，而这样的材料中不一定有可以被搜寻的“民族”、“国民”等词汇。

² 关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建历史，以及其在中国近代人文学术上的重要性，近年来有几本可读性很高的著作出版。见：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岱峻，《发现李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

³ 王明珂，《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导读》，《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王明珂，《华夏边缘》（增订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章。

⁴ 有些学者已注意人类学田野日志、杂记的学术价值与其利用，其看法约为，首先，在田野日志与杂记的书写中，记述者较不遮掩自己对周遭事物的感觉及看法，因此与其作为最终调查成果之“民族志”相比，更可以让我们对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及知识产生过程有所反思。其二，以自己所写的田野日志与杂记为研究参考对象，一位人类学者可以对自己如何选择、如何忽略田野中所见之人事物有所反思，因而得以进一步了解自我及研究对象之社会文化。我认为，除此之外，透过田野日志所选择性记载的田野工作者之每日活动，我们可以探索他们与“土著”间的微观互动，以及此互动及其造成的影响与本地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相关探讨见，James Clifford & George Marcus ed.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äivi Eriksson, Elina Henttonen & Susan Meriläinen, “Ethnographic Field Notes and Reflexivity,” in Loshini Naidoo ed.,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Landscapes and Corridors* (Published on line by InTech, 2012: <http://www.intechopen.com/books/an-ethnography-of-global-landscapes-and-corridors/ethnographic-field-notes-and-reflexivity>), 9-22.

⁵ 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本书原书

田野之旅中的活动，特别是他们与本地人士接触、互动的情况。关于黎光明（及其同行伙伴王元辉）的川西民俗考察，及其著作《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我曾为文分析其意义，并与凌纯声、芮逸夫两先生在 1934 年进行的湘西田野考察作比较¹。该文的主旨为从学者与边疆人群的互动，来重建近代中国边疆之人“少数民族化过程”之一斑。本文将延续这些探讨，重点在于两位学者带着“民族”与“国民”概念至边疆进行考察时，他们的观察与关注焦点为何，他们与本地人发生什么样的互动，以及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事及其间之个人言行，在中国边疆人群少数民族化过程中的意义。

黎光明的川西考察之旅

黎光明，1901 年出生于川西灌口镇的一个回民家庭中。当时像他这样的回民，“回”只是在宗教生活习惯上与他者有区分的群体，而无“民族”认同之意。至少我们由他遗下之《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一书，见不到任何“回族”认同。《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的另一作者，协同黎光明参与此考察的王元辉，也是四川灌县人，与黎为灌县高等小学同学。民国十年（1921），黎光明与朋友们一同出川至上海，准备考大学；此时同在上海的有王元辉、任觉五等川人，都是心怀革命之志的青年。次年（1922），黎光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史学系，王元辉进入天津的北洋大学。分隔两地，但同样的是两人都参加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学潮，而同样因此被大学开除。

1924 年，黎与王以及其他因参与学潮而被退学的川籍朋友们至广州，进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就读。在后来王元辉对黎光明的回忆性文章中，他称，“他原来的老朋友们都已纷纷弃文习武，进入黄埔军校，他因信奉回教，恐军队生活对他不方便，所以留在中大毕业。”² 这应指的是，当时广东大学收容了许多志切革命的青年学生；在五卅惨案及沙基惨案（1925）发生后，这些学生主动要求组成学生军，在广东大学中由黄埔军校施以军事训练。后来这些学生军中有不少人转入黄埔军校，王元辉便在此时成为黄埔军校学生³。

黎光明于中山大学（1926 年由广东大学改名）毕业后，在民国十七年（1928）受聘于刚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该所设于中山大学内）。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该年七月完成立所，黎光明于八月底便由上海启程前往川西“作民俗学调查”。他先至成都与王元辉会合。王于 1927 年曾随北伐军进攻上海，然而中途离开北伐队伍返回四川，主要原因可能恐怕受“清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波及⁴。王元辉与黎光明同行前往岷江上游，获得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之正式允许，此应与那次行程十分危险有关，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同行可增加几分安全。

根据黎提交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察计划书，此原为两年之考察计划⁵。考察目标包括民族、社会、文化、军政、经济，乃至风景名胜、实业展览会等等。以此看来，这并非是一民族文化及民俗考察，更像一为整顿川西经济、社会、军政之整体勘查计划。而黎的确在计划书中称，此成果可作为“治川者之一借镜”。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原预备于考察结束后，在成都将所获成绩

稿之封面标题为《川康民俗调查记录》。芮逸夫之田野日志见：芮逸夫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南苗族调查日志 1942-43》，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10。另外，非历史语言研究所成员的王元辉，也为其与黎光明的田野之行出版一本杂记：见王元辉，《近西游副记》，南京：南京提拔书店，1935。本书内容部份与《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重迭。

¹ 王明珂，《国族边缘、边界与变迁：两个近代中国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新史学》21.3：1-54；本文亦改写收入于王明珂，《华夏边缘》（增订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 章。

² 王元辉，《神禹乡邦》，台北：川康渝文物馆，1983。

³ 王元辉，《学生军颂：广东大学学生军抗暴记》《中外杂志》36 卷 1 期（1984）：95-96；《北洋大学革新风潮》，《中外杂志》35 卷 3 期（1984）：58-61。

⁴ 此讯息为我得于王元辉之女：王女士称，其父当年因知道自己有杀身之险，因此脱离革命军之北伐队伍。

⁵ 《川康调查计划大纲》，《历史语言研究所公文文件》，原档号：元 115-20-1。

公布于著名报纸，并到各学校演讲，“以肆鼓吹”及“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此作为被傅斯年劝阻。与此有关的，王元辉在出发前，写了一篇名为“辞别在成都的朋友们”之公开信，信中写道：

我要去到荒寂的西边。那西边的地方少人识字，少人知道科学，更少人谈得成革命，我觉得有把握处处出风头。¹

此处王元辉所称之“处处出风头”，与前面黎所称“以肆鼓吹”及“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这些用语都显示他们传播国族新知的强烈企图：期望此行能以自身作为知识、讯息传播的桥梁，将国人一向陌生的边疆情况介绍到国族核心人群中，并将国族核心的情况讯息（特别是科学、进步、革命）带给国族边缘之人。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黎光明等对岷江上游人群之文化与族群属性的确所知很少。

此种对国人无知于国族“边疆”的焦虑感，来自于当代人之“国家”及“国民”概念——既然边疆之地为此国族国家领域，其人为我国族同胞，亦为国民，那么国人便不应无知于边疆之地与人。这样的焦虑，也见于1933年广西政界名人唐文佐为刘锡蕃著《岭表纪蛮》一书所写的序文。该序文称：

国家以国民为主体，而吾人又为国民中的一份子，生于其地而不知其民族之渊源所自，而不知其生活苦乐之情况，而不知其在内治国防之各方面，究竟将得若何之结果，若斯人也，其可以云爱国之士者乎？²

由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体会，作序者认为，既为“国民”又身在本地，吾人应对本地之“民族”有深入的认识。该序文提及美籍传教士丁惠民在“蛮族”中所从事的民族学考察，对此他有如下感言：

夫以异邦之人，远涉重洋，去国万里，而适兹土，而求考吾国西南一般蛮族生活之状态，而吾则对于存亡与休戚相关之民族，反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且复大言炎炎，日以扶助弱小民族，号于天下，此岂非党国之羞，而自欺欺人者乎？³

此感言所表露的仍是，“蛮族”既与我等皆为国族之人，存亡休戚与共，我等不应对其毫无所知。接着，作序者提及此书之著作缘由，称刘锡蕃“尝谓蛮人榛狁不化，使社会形成一种斑形之社会，此等斑形社会，绝对不许存留于今日。”以上这段话，更透露着《岭表纪蛮》作者刘禹锡与作序者在其国族认同下对边疆国民的看法——“国民”是同质的个体，“蛮人”既为我国民，自然应受改变而成为国家中的一份子。

沈松桥在一篇论国民与国家的文章中指出，在关怀“国家”之救亡图存大计下，中国近代之“国民”概念缺乏其西方源头之词 citizenship 所蕴含之个人政治主体性，因此“国民”如其字面所示，只是“国家的子民”⁴。这是十分精辟的看法。到了1930年代，在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国民”与“国族同胞”几乎是等义词，且“国民”与“国族同胞”都指具有“同质性”的众人。此同质性的基础，是国民对于国族国家的共同普遍知识——包括国家疆域（地理），域内之人的特质（民族文化）及其来源（历史），以及更重要的，国家现况（政治社会）等等的知识。这些，都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让刘锡蕃进入“蛮疆”的动机，便是让他深有所感的，当时中国国民普遍对于边疆地理及当地国族同胞的无知。此种对于国族国家边疆之认知焦虑，也见于1934年进入川康边区的青年探险家与民俗考察者庄学本身上。在考察归来后所写的《羌戎考察记》一书之弁言中，他称：

¹ 王天元（王元辉），《近西游副记》，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页2。

² 唐文佐，《唐（文佐）序》，见于刘锡蕃，《岭表纪蛮》，上海：上海商务，1934，页3。

³ 同上。

⁴ 沈松桥，《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4分（2002）：685-734。

现在图上对于四川的西北部，甘肃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还是一片白地。民族学的研究者，关于这个地带所得到的报告也是奇缺，我为了这样大的使命更应该进去探一探¹。

早年至岷江上游作语言调查的学者闻宥，结合历史记载将本地一些具有共性的语言称为“羌语”，也因此认识“羌族”之存在。当时他也感慨地称：

我侪今日苟未身至川西，固已不知版图之内，尚有羌人。以一早见于先秦文献之族类，亘数千年，历无数之移徙混合，卒未灭绝，而并世竟无知之者，斯真学林之憾事已²。

这段文字，一方面表达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国人无知于国家边疆的遗憾与焦虑，另一方面，也显示在透过多种学术之国族知识建构中，历史学是远走在语言学与民族学之前的。

当时深受国族主义感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急切期望能认识国族国家边缘之地与人，另一方面他们也为国族边缘之人对国族国家的无知感到十分惊讶。此种“惊讶”，仍因“国民”概念所蕴含的国民“同质性”，与他们所见之“异质性”现实（边疆国民对国事之无知）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刘锡蕃在《岭表纪蛮》一书中论及“蛮人国家观念异常薄弱”时，他以自己在广西省三江任县时所作的一项调查为例；当时他以“我国第一、二届总统是谁”、“什么叫做三民主义”等问题来让30个“苗獠”男子作答，所得结论是：“结果皆令人失望之极”。³

边疆之人对当代国家、国事的无知，在黎光明、王元辉看来也是十分值得注意且有趣的现象；在他们归来后所写的报告中多处提到这一点。以下是见于《川西民俗调查纪录 1929》中的几则记载：

有一次，我们在大寨土官的家里遇着一位林波寺的和尚。他向我们说：“据我们的喇嘛卜数推算起来，中华民国（意实单指元首）应该是个大耳朵的人，不然，他不能管领这样大的地方，大众一定不能服他的。”

杨喇嘛既知道孙中山，并且听说过有蒋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更可惜的是他问我们道：“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底谁个的本事大？”

凝戈也不懂汉语……他从不曾知道有大总统袁世凯，当然更不知道有主席蒋介石。同他谈到南京，他问：“那是洋人地方不是？”⁴

若我们也觉得这些记载有趣，乃因我们皆经过国族主义教育洗礼，自然会觉得这些“西番”喇嘛无知得可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黎光明等人一方面认为凡“国民”应对国事有基本认知，此为国民之“同质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当时边疆与国家本部之间的差异与差距。在田野之旅中，他们透过自身言行到处展示当代中国的科学、进步与现代化。他们经常对本地人炫耀他们的像机、话匣子（留声机）、手电筒，并且常以糖精、用过的废电池、洋烛、铅笔、洋铁烟筒等代表科学进步的产品作为馈赠礼物。相对于此的，他们在报告中常描述本地人的无知与迷信。

在民族考察方面，由典范的民族学、人类学观点，黎光明等人此趟川西田野之旅可说是成果乏善可陈。黎光明递交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果报告，《川康民俗调查报告》被搁置数十年未能出版，且他自川边返回南京后不久便离开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此转任于四川之军政与教育界，如此种种皆证明其在民族考察、研究方面的成绩未能让他立足于主流学术界。我们看看黎光明、王元辉在报告中对各“民族”文化习俗的描述，便可略知为何他的考察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在那时代的典范民族知识中，一民族是有其特定文化、语言与体质特征的群体，民族学、人类学（含体质学）、语言学便是找寻、判别这些民族文化客观特征的学问。然而在黎、王的报告中，两位作者

¹ 庄学本，《羌戎考察记》，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页1。

² 闻宥，《川西羌语的初步分析》《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 2（1941）：60。

³ 刘锡蕃，《岭表纪蛮》，上海：上海商务，1934，页255。

⁴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纪录 1929》，页106、120。

常表示无法分辨羌民、土民与西番的习俗差异，以及羌民、土民与汉人习俗间的差别。如他们描述一羌民的婚礼，称“今天的婚礼，几乎全和汉人的一样，新郎也簪花挂红，新妇也顶盖顶，也有赞礼的，也要拜客。”¹ 他们描述一土民的住家门前装设，称“我们到土民余双喜的家里去。这家人的门前也有‘泰山石敢当’，门额上也悬有一个珠砂判’。”²在体质特征上，他们称“西番假如改着汉装，其容貌没有几许显著的点子与汉人不同。”³

在经过晚于黎光明川西之行的近代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研究后，羌族所戴头帕、村寨建筑与其巫师端公，都成为羌族传统文化特色。而自闻宥以来的语言学家，也从语言内在逻辑证明“羌语”的客观存在。然而当年黎光明、王元辉描述羌民与土民戴头帕的习俗，称：“以缠头代帽，是川西汉人的习惯，并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⁴ 对于端公，他们称：“端公是能够驱鬼的一种巫师。四川境内各处都有，常常在病家闹通宵，名为‘打保福’。”如今羌族端公所奉之神被认为是天神木比塔（或称阿爸木比、木比色），而黎光明、王元辉所见则是，“羌民的端公供奉多神，主要的神是《西游记》上大闹天宫的孙悟空。”⁵至于语言，他们称羌民的语言非常复杂“几乎这一条沟的话通不到那一条沟。”⁶ 这是由本地人之认知观点所见的另一事实——无论各地“羌语”间有多少语言学上的相似性，对本地人而言，他们就是难以听懂邻近另一条沟的人所说的话。

在“民族”概念下，透过历史、语言、民族等多学科之研究，最终是要证实一民族的客观存在，并以语言、文化等客观特征来划分各民族间的界线。但如前所言，黎、王所见不仅“羌民”、“土民”生活习俗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与汉人在生活习俗上也十分相似。黎光明等对“西番”的描述，更称“寨子也就可以说是‘社会的’最大组织了；虽然是一个部落有若干寨子，但各寨之间互为仇杀的事实很多，引为同部而生出感情的却很少。人们似乎也不需要比寨子更大的社会。”⁷ 在此，他们用的名词是“社会”，事实上指的是其成员彼此有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的认同群体。黎光明、王元辉的这说法，与今日羌族为一建立在认同上的民族有相当落差。但在当时，他们的说法是实情。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我曾介绍并说明过去（指1950年代以前）这种极端分散、孤立的村寨人群认同⁸；作为少数民族之羌族认同是1950或1960年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总之，黎光明并不具备民族学或人类学知识，其川西之行的主要动机乃在政治方面——为国家及国族认同而探索、认识边疆，也让边疆之人认识今日中国。当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对他知之甚详。1929年当黎正在田野旅次，傅给黎的一封信中指责他，“盖兄之未预备充份，兄之所知也”——指的是黎未有足够的民族学专业知。在同一信中，傅以“应尽舍其政治的兴味”、“少发生政治的兴味”、“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三度提醒他勿涉政治⁹。这些都可说明黎光明在田野考察时心之所系怀主要为“国家”与边疆“国民”，而对认识与区分“民族”感到困难且无力。

黎光明在离开史语所后，曾任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政治教官、中学校长、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委员、成都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等职。1943年他又回到岷江上游的茂县，受命担任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秘书（第十六行政督察区，管辖范围是：茂县、松潘县、汶川县、理番县、

¹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页 167。

² 同上，页 169。

³ 同上，页 29。

⁴ 同上，页 172。

⁵ 同上，页 175-176。

⁶ 同上，页 174。

⁷ 同上，页 58。

⁸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三章、第四章。

⁹ 见《川西民俗调查记录 1929》，页 183-85，附录一《傅斯年致黎光明的信》。

懋功县、靖化县），1946年转任靖化县县长。这些任命应与当年和他一同在此考察的好友王元辉有关；王元辉时为保安处副处长兼十六区专员，其任务为建立及巩固国民政府对川康边区的掌控。他们两人在此直接面对的敌人，则是其势力在此盘根错节的袍哥烟匪头领们。在黎光明就任靖化县县长两个多月后，他设宴刺杀本地袍哥头领杜铁樵，自己也在袍哥党徒的报复性攻击中遇害身亡。可以说，从青年时期开始，黎终其一生都在从事“国民革命”。

芮逸夫的川南苗族考察

芮逸夫，江苏溧阳人，生于1898年。曾就读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外文系。1927年，就在他即将完成大学学业前，大学因卷入南北政争而陷于停顿，芮先生只好离校。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三位早期民族学者，皆曾就读东南大学，但命运不同。凌纯声早先毕业，并得留学法国，习人类学；黎光明在校参与政治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学校也迫于政治风潮而停课；芮逸夫则是政治风潮的受害者，无法完成其大学学业。

1929年，黎光明川西行的那一年，时为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的芮逸夫，经凌纯声之介绍而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担任助理员。他先在北京随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及国际音标记音，为进行民族调查作准备。1934年中央研究院内部改组，社会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于是凌纯声、芮逸夫至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不久该所又聘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统计学与人类学博士吴定良，以及德国汉堡大学体质人类学博士陶云逵等学者。由以上学者组成之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是当时国内阵容最强大的民族调查、研究团体。芮逸夫虽未受过学院式的人类学训练，但其与凌纯声、陶云逵等人长期共同进行田野考察，加上他十分勤于钻研人类学典籍，因此后来成为中国人类学先驱学者之一。

1933年芮逸夫与凌纯声赴湘西南凤凰、乾城、永绥等地，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湘西苗族考察。1934年，他又与凌纯声到浙江白门、丽水、青田一带作畚民调查。1934-193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受云南省政府之邀，进行云南省内的民族调查，参与学者有凌纯声、芮逸夫、陶云逵等。此三年之间，他们的足迹遍及云南大理、保山、腾冲、耿马、班洪、孟连、蒙自等地。在此期间，芮逸夫、凌纯声又曾参与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勘界之旅，他们与中英双方代表在军队护卫下至滇缅边境之班洪、班老、南大等地。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迁徙至云南昆明北郊的龙头村，后又在1940年迁四川李庄。此一时期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并未中断。1939至1940年间，芮逸夫曾到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调查。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查，芮逸夫、凌纯声与马长寿等一同至川西马尔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进行有关“西番”与羌族考察。以上从1934至1941年，芮逸夫所从事的民族考察多为普查性质，而未对任何一族群或聚落作较长期且深入的考察，因此也未有具体报告或研究成果出版。

1942至1943年，芮逸夫与胡庆钧到川南叙永进行苗族考察¹——这是在1933年湘西苗族调查之后，他所从事的又一停留时间较长的田野调查，并留下田野日志，与一本专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²。田野日志于2010年以《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43》之名出版³。日志由1942年12月1日芮在叙永的长江边上启程记起，至田野调查结束后的第三日1943年5月

¹ 根据芮的田野日志，1943年1月10日起他与胡庆钧先生分途进行田野，胡前往枳槽工作。2月25日两人会合于叙永，胡旋于28日经泸州返回李庄，芮则续往马家屯、大坝等地作调查。胡庆钧对此行之回忆与记录，见其所著《川南苗乡行》。

² 芮逸夫、管东贵，《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³ 芮逸夫著，王明珂编校、导读，《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43》，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10。

18 日止；此日芮写下日志最后一句，“与王（古宋县府科长）同至街上吃面，盖今日乃余之四十五生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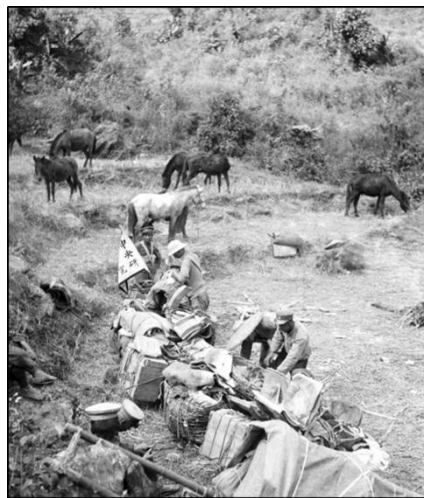
芮逸夫在这约半年的调查采访中，在乡间勤于学习及记录苗语，采访及观察苗民婚丧礼仪，记录当地人的经济生活与老习俗。在城镇中则与当地军政首长、县府职员应酬，到处为人照像、冲洗照片以广结人缘。我们可以由其田野之旅初期的一日活动，窥见当时社会背景之一斑。

（民国 31 年 12 月）十日，星期四，在叙永，13。

七时半起，八时许早餐，购皮鞋一双（价 200 元）而返。十一时与胡同至县府拜访何本初县长，谈西南两乡（一、三两区）苗情颇详。并为余等建议路线；由后山堡，视槽沟，分水岭，双河场（在云南威信），再返分水岭，而至黄泥嘴、清水河，至大坝。后赴宴之主客陆续而至（叙永党政机关法团士绅请客）。第廿四师廖师长、唐团长、徐团长亦先后到，此外尚有岳县议长（年已六十七，曾任蔡松坡将军之秘书）、李参议员铁夫、卫生院何院长、县党部郑书记长等。一时许入席，共四桌，廖师长中席首座，余左席首座，同席有李参（议）员、何校长、何院长、李副县长议长等。二时半席散，摄影两帧辞出。与何校长同至省高中讲中华民族之意义，胡讲种族平等之意义。五时毕，曹教员邀往晚餐后，即辞别返寓。何海德教育科长来谈苗教育颇久，袁亦来约明日偕人来谈苗情云。十时睡。¹

次日，十一日，两人至县中对全校两百余学生演讲；芮逸夫讲“谈求学”，胡庆钧讲“中华民族的出路”。此两日之活动，反映芮逸夫此半年田野考察中的几点普遍情况。其一，在田野行程中芮经常与地方政界、教育界人来往来应酬；其二，芮常受邀至地方政府、学校演讲，讲题多与“民族”有关；其三，芮经常接触到一些有心于地方文化教育建设的本土知识分子。以下我就此三点作些说明。

首先，芮先生常与地方军政首长交际，最简单且直接的理由便是当时这些边陲地区社会秩序混乱，多匪多兵，且常兵匪难分。芮逸夫在此下乡进行田野考察，自然需赖本地驻军、乡团保护，因此也不得不与这些有力人士相应酬。然而，从湘西、云南到川西、川南，当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正式民族考察皆有军队相随，以及成员们皆常受各级地方首长接待，此亦显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于“民族”考察之重视——此并非只是纯学术的考察，而涉及如何建立一套包含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学等等的民族与民族史知识，来将性质归属浑沌不明的边疆之地与人纳入整体国族与国家体系之中。在那中国国运艰难、内忧外患交煎的年代，史语所能够积极从事相当耗费财力之考古发掘、民族考察，以及珍稀文书、典籍、文物之搜罗，皆因获得当时国民政府之强力支持，而此也印证着学术与国族国家关系密切的时代背景。



其次，此相关的，芮逸夫与胡庆钧等在田野之旅中关于“民族”的演讲。除了前面提及的两场外，有一次，芮、胡与某团部连长以上军官共二十余人座谈，“随意谈各民族问题”。还有一次，芮在古宋参议会之扩大纪念周会上演讲，讲题为“由古宋九族说到西南民族”。田野日志中还提及几场演讲，但都未记录讲题。就这些以“民族”为主题的演讲来说，芮逸夫等人以来自“中央”的民族学者身份，自然经常未能免俗地受邀作这方面的演说。不仅是在演讲中，在他们与当地知识分子的社交言谈中，“民族”也经常是重要主题（如后面提及的芮与韩介休交谈之例）。此显示民族学者及其田野考察工作，在近代中国边疆人群之“少数民族化”过程中的微妙角色与

¹ 芮逸夫，《川南苗族调查日志 1942-43》，页 5-6。

功能——不仅民族学内蕴的“民族”概念与其内涵定义，导引学者们探寻、研究相关人群之语言、文化而让他们得以认知与识别一个个的“民族”，在边疆田野考察中经由与本地人的紧密接触互动，民族学者们也对本地人群，特别是其知识分子，介绍、传播及强化民族、少数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并与他们在本地“典范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知识”上彼此沟通、相互影响。

当然，此对于边疆人群之“少数民族化”造成多大的影响，是因人、因情况而异的。一个特殊的例子见于芮逸夫、凌纯声的湘西田野。当时作为他们助手的本土知识分子石启贵，因受两位先生之启发，投身于本民族文化之调查、保存与传扬。后来他多次上书国民政府各党政机构，附以其考察成果之专著¹，来证明本地“土著民族”²为一有特定文化的民族，因此呼吁国民大会中应有南方“土著民族”代表席位。1947年他终成为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之土著民族湖南代表。

石启贵也与我们要提到的第三点有关——芮接触到的一些有心于地方文化教育与社会建设的本土知识分子。芮在川南各苗乡结识韩介休（震东乡）、罗文才（枳槽）、罗承瑄、马俊良（海坝）、马俊森（海坝）、杨德明（海坝）、古元生（马家屯）等人，并得到他们很多协助。据芮之田野日志记载，韩介休于1941年筹组“叙蔺边民文化促进会”，1942年创办边民学校八所，至芮来访之时已建有十二所学校。马俊良、马俊森、杨德明等，都是边民小学的老师，他们也都是边民小学之支持机构基督教福音教会的信徒。芮逸夫与韩介休面谈之后，在日志中写道：“与介休谈苗族一切问题，颇有见地。以一耶稣教徒不为耶教所囿，尤为难能可贵。”他也写下他们所谈的问题，“边校创办之经过及其现况”、“苗人之政治地位”、“苗人之社会地位”、“汉人心理上鄙视苗人之例”、“苗、夷、汉种族混杂之事例”、“余、杨、苏、李、陆皆奢崇明之后”等。罗承瑄为福音湾边民小学校长，非本地人，据芮日志记载罗曾与裴牧师之妻（Mrs. Birk）、杨马可等以创制苗文编成《福音诗歌》。在田野中，芮逸夫以其语言学知识协助罗承瑄等研究改良苗文拼音字母。如其日志在1943年1月22所载，“早膳，将耶稣事迹一诗复习一遍，并作元音分韵表，以各单词系之”；次日又记道，“九时许早餐，即将福音诗歌翻阅，觅其尚未见用字母之字”。4月21日记载，“今日与罗承瑄将苗文字母，每一字母举一例字，研究改良方法，直至晚上。”韩介休、马俊良、马俊森、杨德明等人则协助芮考察本地语言、宗教、婚丧习俗。

这是很奇特的合作、互惠。一般而言，这些力图以教育文化与经济实业来让本民族“进步”的地方知识分子，对于苗乡“旧习俗”是不感兴趣的，甚至认为它们是应被革除的对象³。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以民族为体相互竞争、物尽天择，因而它蕴含着“团结”与“进步”两种特质；此让“旧习俗”（或传统文化）有些尴尬——它们即代表能凝聚一民族的共同文化特色，又代表过去及不进步。受民族主义熏染的苗疆知识分子也因此可略分为二类：一从事于以实业、教育来促成本地社会之“进步”，一从事于考察及宣扬本民族固有文化来促成民族“团结”，以及证明及宣称本民族的存在。前述湘西石启贵之一生事业转折，便是很好的例子。他于大学毕业后，变卖家产购织袜机、纺纱机、照像机及新品种水稻种子等返乡，投身于教育及农业改革等多项新事业，组织“乾城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然而在1933年协助凌、芮从事苗族文化考察后，从此他将大部分心力放在苗族文化、语言资料搜集上，后来成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之“土著民族”

¹ 此书即为石所著《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该书后来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之名于1986年在长沙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² 由于当时在湘西，“苗”被认为是汉人对本地土著的辱称，本地人不接受这样的称号，因此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以“土著民族”称之。

³ 在凌纯声与芮逸夫1933年的湘西苗族考察之行结束后，即有本地知识分子对凌、芮两人深入苗乡采访记录本地旧文化习俗十分不满，而向“蒙藏委员会”提出控诉。资料见于，南京第二档案馆，全宗号：三九三，案卷号：280。以及，王明珂，《国族边缘、边界与变迁：两个近代中国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新史学》21.3：1-54。凌、芮在此调查之成果专著中，也对这些苗乡本土知识分子反唇相讥，称：“而苗中稍受教育所谓有识之士，谈及他们的鼓舞，常引为奇耻大辱，以为是暴露他们野蛮的特征”；见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上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7，页202。

代表——此为湘西“土著民族”得到国家认可的表征¹。

川南叙永的韩介休等人，是借用或配合基督教的组织与力量，从教育着手来促成苗乡“进步”的本地知识分子。这一类型南方苗乡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是贵州威宁人朱焕章，一位由英籍传教士博格里（Samuel Pollard, 1864-1915）所办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苗乡精英。朱在1943年创立石门坎中学，其教育事业在苗乡造成极深远的影响²。恰巧而具有深意的是，第一届国民大会中之湖南“土著民族”代表有两人，除了前述石启贵外，另一人便是朱焕章——两人分别代表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苗乡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韩介休等追求“进步”之叙永苗乡知识人，对芮逸夫的“苗俗”考察却是多方协助，并无阻挠。另外一位芮逸夫川南考察之行的主要协助者，马家屯人古元生，在芮返回李庄后，同年9至12月受邀至李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向芮逸夫等人提供苗语及苗俗讯息³。古元生原来想就此机会读书、学习，以从事民族研究，但后来仍决定返乡投入共产党之革命活动⁴。古元生放弃民族研究而选择的另一条道路，也是一种追求“进步”的努力。

另外，芮的日志中常提及他随手翻阅身边的书。一次是1943年除夕前数日，在海坝乡的寄居处他翻阅一本《国民政治教本》，录下书中所载“耐饥法”之食物制作。随后他又阅读一本人类学著作，查理士·魏格雷（Charles Wagley）所著《一个危地马拉村落的经济情况》（*Economics of a Guatemalan Village*）之Economic Cycle章。前一书，《国民政治教本》，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首页标题旁有“保训合一干部训练适用”等字。“保训合一”是国民政府为强化地方控制而定的一种办法，让地方保甲干部（如乡长）兼任军事及训政干部，所谓保训合一干部，以建立地方保安武力以及推动政令。由其内容看来，本书可称是一政治化的国民教本，它一方面对地方乡里保甲干部倡导、传输一些基本的国家、民族、历史与国际常识，一方面教这些地方基层干部如何应付如防疫、救灾、治安、清匪等地方事务。如本书《政治训育篇》之第二章为《公民常识及国势》，其内容：第一课“第一次革命与中华民国的成立”、第二课“国旗、党旗、党歌”、第三课“中华民族”、第四课“黄帝”、第五课“民族英雄”，等等，所述皆十分简短（如第三、四课均只有三行文字）。芮逸夫觉得有趣而随手抄下的“耐饥法”出于本书第四编《卫生训练》；在介绍各种常见疾病如沙眼、蛔虫之后有此“耐饥法”一节⁵。将“耐饥法”与流行病并列的编辑安排，显然是将饥荒视为与各种流行病一样的地方危难。由这些内容看来，此书应非芮逸夫所有，而是主人家之物。

后一书，《一个危地马拉村落的经济情况》⁶，出版于1941，也就是芮逸夫此田野之行的前一年。此书应为芮逸夫置于行囊随身阅读之人类学著作。目前史语所之傅斯年图书馆中仍藏有此书；很可能，这便是芮逸夫携往田野的那本人类学田野报告专著。在为避日本侵华战祸而迁于四川李庄山区期间，史语所（或其成员）仍有办法自国外取得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并携至田野行旅中阅读，可见当年如芮逸夫这样的史语所民族研究者在汲取西方人类学知识上十分积极、快速。

¹ 王明珂，《国族边缘、边界与变迁：两个近代中国边疆民族考察的例子》，《新史学》21.3：1-54。

² 关于博格里在贵州的传教、兴学与创制苗文，石门坎教会之教育模式在川、滇、黔三省交界之苗乡的传播，以及朱焕章之生平及其贡献，见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张慧真，《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基督教族群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期；秦和平，《基督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

³ 见芮逸夫、管东贵，《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页3，自序。

⁴ 此讯息为我在2007年11月访叙永马家屯时得自于古元生之子。

⁵ 《国民政治教本：保训合一干部训练适用》，成都：中央军学图书馆，1938；国家图书馆有此书，见于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民国图书。

⁶ Charles Wagley, “Economics of a Guatemalan Village”, Supplement to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ume 43, No. 3, Part 3, Number 58,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Menasha, Wis., USA, 1941). 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此书（调查报告），与同年出版、同系列之三本调查报告于1958年共装成册。同一系列（由美国人类学学会出版）的田野专刊，史语所自创所第二年（1929）即开始订购。

还有一次，1943年除夕，芮逸夫在海坝乡马俊良家中，翻阅马家的书两种。一为卢卡斯·里德（Lucas A. Reed）所著《埋藏的财宝》（*Buried Treasure*）；此书内容为劝勉基督徒应依从《圣经》中的教诲，即刻从个人及身之事开始有所作为，以追求上帝所赐财富（永恒喜悦）¹。此书应是身为边民小学教师及基督徒的马俊良得于外籍传教士。另一为顾颉刚、王钟麒著《本国史》²。芮并为后一书在其田野日志中作以下笔记：

1. 中华民族是怎样组合的？2. 中国的文化受到外缘的影响怎样？3. 中国势力影响到域外，起怎样的变化？4. 中国现有的领域，由怎样的蜕变而成？民族、社会、政治、学术的四方面。构成中国历史的民族是华、苗、东胡、蒙古、突厥、藏、韩七族，七族之中，华族是主要份子。

本书为初中历史教科书，且芮在其田野日志中抄录其部份内容，皆显示此书很可能亦非芮所有，而为马俊良家中藏书。这些性质全然不同的书，于1942-1943年同时出现在川南叙永鲜有人识字的乡间，反映着基督教、国族政治、国族史学、人类学等外来知识与相关权力体系在此汇合，相互呼应或彼此交锋。芮逸夫便在此情况下来到叙永乡间，受到“保训合一干部”之乡长及其团丁们的保护，受志切提升本民族地位之苗乡知识分子（包括边民小学“耶教徒”教师们）之助，考察本地婚丧习俗，而其目的在于解答一些问题，以完成顾颉刚等学者之《本国史》、《中国民族史》所建构之中华民族拼图中一重大缺环——整个中国南方与西南被称为“苗”（或土著民族）的人群究竟是一个民族或是多个民族？在历史上他们与汉族的渊源为何？在语言、文化上他们如何与汉共同构成中华国族？

中华国族之构造：芮逸夫川苗考察前后的著作

芮逸夫在1943年赴川南苗乡进行田野考察前后，约在1941至1944年之间，他对于“中华国族”之构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因此我们可以由此探索他当时心之所系，以及此田野考察之意义。首先，他在1941年发表《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一文³。在此两年前，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曾函中央研究院，请相关学者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带有污蔑意味之命名（如獠、猺）进行研究改正。此工作之成果，《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主要由芮逸夫完成；该文便为对此的后续补充说明。

1942年他发表《中华国族解》一文⁴。该文首先化解“中华民族是一个”或其中仍可分析出多个民族之争⁵；芮以中华民族是达名的类，蒙古民族、西藏民族等乃私名的类或次亚类，以此他认为从政治观点中华民族不可分，“但由学术观点来说，是可以析出不少个体的。”接着，他称中华国族是中华国家、中华民族两者结合之复合词的简称；他认为有地域、人种、语言和文化等四种意义之中华国族，在此四种意义上中华国族都是多元的。最后他呼吁以“中庸之道”作为中华国族之国族性。在这篇文章中，他用力最深的便是提出“语言的”中华国族架构——包括两大语族，支那或汉藏语族与阿尔泰语族；前者包括汉语、泰掸、藏缅、苗傜四个语系，后者有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系。文末作者注记该文于1942年6月12日完成于李庄，此时约是他

¹ Lucas A. Reed, *Buried Treasure: Mountain View*, CA: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27.

² 此书应为顾颉刚、王钟麒所编《现代教科书初中本国史》，该书于1929年为国民政府查禁。

³ 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2卷第1、2期合刊（1941）：113-190。

⁴ 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2期（1942）：133-139。

⁵ 这是指1939年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而引起的一场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争辩；见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出发往叙永的半年前。

他在 1943 年发表的《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¹，写成于 1942 年 3 月，初稿更早在 1938 年完成。在该文中他首先说明写作目的——语言学家主张要从事并完成足够的语言调查才能谈语系分类问题，但民族学者想依语系分类来分辨族类，芮称若要等到各族语言调查清楚岂非如“俟河之清”，所以他先就已发表之语言学家对中国南方及南亚语言分类之各家意见作比较，提出中国西南民族语言分类的大架构。他特别注意苗瑶语的分类地位，主张它应和傣、藏缅、孟克语并列为中国西南民族的四种语系。在本文之末他也提出自己对于语言教育的看法，建议为西南各民族语言创造拼音文字，让他们可用以记录及阅读，而且他建议要用“同一系统之文字或字母”来拼缀汉语及各西南民族语言。他以自己在云南所见部份夷族以传教士所创拼音文字读经书的例子，说明此事不难达成。

他在 1946 年发表之《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²，初稿完成于 1942 年 8 月，约三个多月后他出发往叙永；此稿可能便是他发表于 1944 年的《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一文³。自叙永返回李庄一年多后的 1944 年底，他将之修订改写为《再论》一文。这篇文章首先指出，“中华国族大体来说，是同一血统、同一生活、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风俗习惯”。接着作者以“国父所讲造成民族的五个因素”——血统、生活、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来描述中华国族的多元性。然后，作者进一步以生活、语言、宗教来将中华国族分为六个支系共三十组。六支系之一为南方支系，分苗、瑶、畲、蛮四组。

从以上几篇完成于其川苗田野考察前后的文章来看，芮逸夫此时所从事的是宏观的国族建构；建立一个主要基于语言学和民族学的知识体系，来说明中华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支系“民族”，以及这些支系如何汇集而联结到整体中国民族之主干上。这也是我所称，中国近代“华夏边缘再造”（或边疆人群的少数民族化）——将过去华夏心目中的“夷戎蛮狄”转变为国族内的少数民族——之过程的一部份。可以说，芮逸夫的这几篇文章几乎便是中国南方边疆人群少数民族化过程的缩影：先是在对边疆人群的称号上去污名化，然后主要透过语言分类系统来区分及识别本地各个少数民族群体，最后以打通语言障碍及教育来促成各民族间（特别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团结。

由这些文章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学术与政治现实上，芮逸夫先生川南叙永考察之行的目的在于以人类学田野材料（主要为语言及婚丧礼俗）来证明苗族的存在，以此应和语言学家所建立的“苗语”、“苗瑶语”等语言人群范畴，也为其根据语系分类所建立之中华国族架构作一脚注。在另一方面，川南苗乡之行或许是芮逸夫学术事业的一个转折点；由其 1945 年以后发表的文章来看，除了仍关怀边疆民族问题外，他对于亲属体系研究产生很大的兴趣。亲属体系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婚丧习俗是亲属关系下产生的仪式化表征；芮在川南对“鸦雀苗”婚丧习俗及亲属称谓的资料搜集、研究，应是他个人学术志业转向的重要关键。在川南田野之行中，他携带一本美国人类学会新近出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随身翻阅，此或也显示他正在由着重民族识别、分类的民族研究，转向重社会文化分析的人类学研究之中。

芮逸夫在对日抗战结束后，以其对西南边疆之熟悉，曾任国民政府之立法委员，因而在边疆教育、少数民族自治、语言问题，等等方面对国民政府作了许多建言。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后，除了继续在该所从事其中国民族研究外，他也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学，直到其去世之前，因而成为台湾人类学之播种先驱学者之一。

¹ 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民族学研究集刊》第 3 期（1943）：44-45。

² 芮逸夫，《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民族学研究集刊》第 5 期（1946）：29-40。

³ 见于《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成都：中国民族学会，1944。

结语

在发表于 1899 年的文章中，梁启超对“国民”有如下的界定：“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¹ 对于“民族”，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称：“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² 此时是 19 世纪之末，在往后三十年里经过立宪改制与革命建国之争衡，经过中国民族国家的“民族”内涵之辩驳，最后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起“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承继清帝国版图内之地与人，但如何建立一套知识体系来说明“中华民族”内各人群有区别又为一体之关系，以及如何将边疆之地与人纳于国族国家之政治结构与秩序内，是政学界的共同关怀。

当时最有“民族”争议的是南方与西南边疆。由于长期汉化效应，云贵川桂等省都有相当多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即使能分辨汉与非汉族，南方与西南中国广泛被称为“苗”的人群，他们究竟是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仍不清楚。更大的争议在于，在南方及西南边疆人群中进行调查研究终而划分各个民族，是否会减弱“中华民族”之一体性及其内部团结，这让关心国事者不得不忧疑。芮逸夫所从事的苗乡田野考察，与其关于中华国族的研究与论述，便是通过对湘、川、黔与滇各省“苗乡”的实地考察，找寻及划定西南与南疆“苗族”的范畴边界，将他们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分别出来，同时以体质、语言、文化等将各民族由枝叶到主干地联结为一中华国族之巨树。

由此衍生的问题是，边疆之人是一“民族”群体或个别“国民”身份存在于国家之中？这问题在当时并未受到特别注意，今日仍然经常产生一些困扰。黎光明、王元辉在他们所留下的考察报告中虽然未有只字提及“国民”，但由于两人深切的“政治兴味”（傅斯年语），他们实抱持着国家、国民等概念来观察周边的人与事，以此发抒其感想，以此与本地人互动。他们嘲弄喇嘛们对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南京等国家符号之无知，相对于此，他们称赞瓦寺土司索季皋“辄引报章杂志”来谈论政治时局。由是可知，民族学知识不足的黎光明与王元辉，虽从事的是“民族”考察，他们的主要关怀却是边疆“国民”。然而在此时，“国民”被人们简化为具有国家（与民族）历史、地理与政治基本常识之民，且应求新、求进步，以因应民族国家间优胜劣败的生存竞争。因而除了嘲弄边民对国家基本常识（元首、三民主义、首都等等）的无知外，黎、王两人也嘲弄本地边民的迷信、落伍，以及到处炫耀自身——来自国家本部之国民——的科学与进步。

最后，黎与王之考察目的，是想让社会大众认识国家之边疆与边民的情况，突显国家本部与边疆之间，在科学与迷信，进步与落伍，对国家之认识与无知，等等方面的对比与差距。王元辉在其此行之副产品《近西游副记》一书中写道，“有人问我‘松潘离成都有多少远’，我说‘相隔四千年’。这虽是滑稽之谈，确是事实如此。”这是以时间差距来形容边疆的落后。同书另一段描述茂州（今茂县）一带羌民的文字称，“他们的语言习惯，甚至面貌，都大概与汉人一样了，直接做中华国民，虽然有时觉得资格不够，但除却一层土司的压迫，又何乐而不为呢。”此处作者所言“资格不够”作为国民，应仍指的是他们在经济生活、在对现代科技的认识、在对国家的认知等等方面的落后。

弭平这样的差距是打造“国民”必要的步骤，其方法可能包括以军事手段扫除障碍，在政治上建立全民参政之制度，以国家财政来均衡区域性经济落差。以及更重要的，以教育来启迪民智，让每个人皆能从国民教育中获得一些知识以培养其国民素质，和对国家、国族的认同与情感，知其社会权利、义务，因而能以行动对外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对内争取及实践其“国民”身份与

¹ 哀时客（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光绪 25 年（1899）9 月 11 日，页 3b。

²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 2 册，文集 13，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 72。

地位。在当时，由黎与芮等人的田野杂记、日志也可看出，国民政府在边疆连扫除毒梟、军阀以维持社会治安秩序都力有未逮，更遑论以教育启迪民智了。虽然如此，由《国民政治教本》这种内容涵括历史、地理、政治、军事、公民素养、国民生活等层面的政府出版品¹，出现在川南叙永乡间百姓家中此一微观社会现象，表示当时的国民政府一方面努力以乡里保甲制度维持地方治安、巩固政权，另一方面也透过乡里保甲干部传播基本的国民“常识”——虽然相当初步及粗糙，但仍可说是“造国民”工作的一部份。值得深思的是，此时在川滇黔边区推动平民教育最成功的是基督教会建立的学校。这样的学校教育宗旨是让人人能读《圣经》，而从经义教诲中得到救赎——“个人”的而非某“民族”的救赎。对于在叙永乡间协助芮逸夫的那些基督徒边民学校校长、老师们来说，他们似乎也希望透过教育造成“个人”的提升，最后藉此促进本地苗人“民族”地位的提升。

过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20世纪上半叶，“国民”与“民族”概念传播于中国，也随着民族考察者的脚步进入边疆；在此造“国民”与建构“民族”同时进行²。芮逸夫及同时代之民族学者们所从事的边疆调查研究，以及改正传统上汉人对异族有污蔑意味之族称，其主要意义便在于此：造民族。在另一方面，黎光明、王元辉之田野考察报告中流露的却是对于边疆民众缺乏“国民”知识及素养深怀忧虑，感觉他们作为“国民”有些资格不够（如王元辉之语）。此种对边疆“国民”无知于国家、民族之事的忧虑，随之而生的期许及呼吁便是以教育（边民教育）来改造边民，也就是造“国民”。芮逸夫在川南叙永苗人乡民家中所见的《国民政治教本》，可以说，也是当时国民政府“造国民”工程的一种工具与表征。

后来，造民族的工作持续进行；经由学术调查、研究，一个个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特色、历史源流被确认，透过政治实践各边疆人群被分类、识别而成为国族中的少数民族，国家并以种种政策来弥补其经济、社会边缘弱势地位。此便为今日，如费孝通先生所称，56个民族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体系。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能够快速达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办法，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中原帝国之人将其南方边疆人群视为“蛮夷”的人类生态。然而其缺失也十分明显。刻板的少数民族（以及原住民）文化与宗教知识，让接受此知识并以此建立其民族身份认同者（少数民族或原住民），难以摆脱其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命运。强调“纯粹”与“典范”的民族文化、宗教，容易形成他我边界分明的部落主义（tribalism），增添社会人群间的对立与冲突。与此相关但更严重的是，民族认同（无论是主体民族或少数民族、原住民），诉诸人类群体认同所系之根基性情感（或想象的血缘关系），因而常在情感超越理性的情况下，让民族内的性别、阶级、世代、圣俗间之剥削、不平等与暴力被遮掩或被忽略。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许多民族国家之中。

在造国民方面，以当时国民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与“新生活运动”等等之社会教育来看，其所打造的主要是爱国、具民族使命感，因而能团结以御外的“国民”（national），而非能对内行使其民权的“公民”（citizen）³，或最多只是徒具形式民主能力的公民。近十余年来在中国一直有检讨当前民族政策的议论，争议关键在于是否仍将“民族”视为一政治化之人群范畴，或应将

¹ 公民素养是指关于公民之权利、义务以及会议规则等等之知识养成。国民生活则特别指当时国民政府所推动的“新生活运动”之国民生活规范。在《国民政治教本》中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如第二章《公民常识及国势》之中，即包括有一般性之国民史地知识与公民知识，第三章则为《新生活须知》。

² 王明珂，“如何观看与了解边疆”，《文化纵横》2014年第三期。

³ 一国之民在英文中有两个词 national 与 citizen：前者一般中译为国民，后者被译为公民。两者有相当重迭但不尽相同，且在国际间因国而异。简单地说，国民为具有某国之国籍者，而公民指有一国之公民权者：前者强调一个人对外的国际属性，后者强调其在本国的政治权力与义务。一般来说，国民不一定有公民权而成为公民，然而在许多国家不具有或被剥夺部分公民权者（如女性及未成年人）亦被视为该国公民，因此公民与国民变得无别。

之视为“文化”之族群范畴而淡化之，以强化一体之国族与国民认同¹。看来，面对如何将边疆之地与人纳于中国之民族国家政治结构与秩序内此一重大问题，当年中国政学界精英们共同践行的是一条便捷的道路，也就是造“民族”，以此构建多元一体之中国。而造“国民”的工作，和以每一国民为单元的多元一体中国理想，虽然由国民政府时期到1949以后一直进行着，无疑这是一条艰辛、漫长、曲折但仍必行的道路²。

【论 文】

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28-1947³

田 耕⁴

内容提要：1928-1947年的西南边疆调查，是中国社会研究史上激活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边疆调查的关键时期。三个学科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对此后影响深远的新传统。本文结合边疆研究的生平史和对研究作品的概念考察，表明1934年中研院的机构调整促成了社会科学所和史语所各自的关键转向，使其分别形成了结合经济史与民族史的田野工作理念。其中深蕴的历史想象，与南迁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在边疆继续“民族志社会学”的“自然史”理念有着深刻的区别。

关键词：边疆调查；西南民族；民族志社会学；自然史

1947年4月19日，结束抗战的中国在成都蜀中饭店迎来了边政学者和蒙藏委员会官员举行的“边疆自治与文化”会议⁵。从事边疆调查的学者在这个会议上根据战时的研究经历讨论了如何重建边疆的问题。这一会议，更像是这些经历了艰苦的边疆调查的学者据此对边疆之未来的交流。与会学者从事研究的边疆地点并不相同，但无不在战前和战时的边疆调查中完成了各自关键的学术转型，成为20世纪上半叶边疆民族调查的中坚力量。就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旧一新的两部边疆民族考察报告：凌纯声和芮逸夫1940年写就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和林耀华的《凉山夷家》。两部同年出版的著作所依据的调查却隔了十年之久。《湘西苗族考察报告》是凌、芮两人1933年在湖南进行苗族调查的民族志，而《凉山夷家》总结的是已随燕京大学从成都返回北平的林耀华1943年进入四川、西康和云南交界的大小凉山所做的田野观察。

¹ 相关讨论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122-133；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前者之文倡议建立“国民”意识与认同，后者之文强调“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两篇文章都指出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中强化“民族”认同，而未注重边疆人群的“国民”身份认同。对此之反对意见亦不少；其中之一见，郝时远，《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13日。

² 从某种角度来说，造就有认知与反思能力（而非仅具形式民主如投票能力）的国家公民，在全球国家中都相当艰难，而经常受到各种诉诸根基情感的群体认同干扰。特别是在网络传媒普遍流行的时代，各种“部落主义”（tribalism）——宗教部落主义、民族部落主义、职业或阶级群体部落主义——皆藉网络来凝聚与动员其群体。这样的发展倾向，特别是各种网络群众带领者煽动的民粹主义（populism）盛行，近年来已明显地逐渐侵蚀“公民社会”所赖的个人理性认知、判断与反思能力。

³ 本文刊发于《学海》2019年第2期，第22-33页。

⁴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⁵ 出席会议者包括凌纯声、芮逸夫、柯象峰、马长寿、许公武、卫惠林、马学良、梁瓿第、周昆田、张承焯。凌纯声、芮逸夫和马长寿等人的发言刊登在《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年）第二期。

成都会议和两部边疆民族调查著作的出版，距离和凌纯声同年、长林耀华八岁的杨成志孤身进入凉山正好 20 年。在以中国西南的凉山开启和结尾的 20 年中，边疆调查逐步变成中国学术史上独立的研究类型。要继续讨论上述 20 年间作为学术类型的边疆民族调查，边疆危机的加深和学术传统的转化是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史情境。首先，因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边疆田野工作多是在 1930 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加深之后进行的，研究者们会时时遭遇到在内地与边疆之间激荡的关于国家、国族与民族的争辩（马戎，2016；温春来，2018: 31-264）。边疆危机引发的论证也变成了国家与国族观念演变的契机。深入的田野工作使得这一学术类型的建设者在族与国的观念上区别于没有此经历的上一代学人。而这段学术史很自然地变成了重新理解和书写民族与国家的历史。

第二个基本的视角是将这 20 年的时间视为西南边疆民族调查运动（survey movement）开展的历史，因此将西南视为学术传统转换的场域。在此转型发生之前，传教士融民族学、民俗和语言观察为一体的田野调查不仅极大地启发了早期汉学，也在 20 世纪初达到了为现代中国学者认同的高峰（黄文山 [1936] 2013: 29；徐益棠，1946；王建民，1977: 61-73；王利平，2016: 120）¹。因此，本文从西南边疆民族调查的历史中选取的 20 年，首先是大量接受西学和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中国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密切进入中国田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学者除了需要在田野中思考训练自己的域外传统，还需要面对数量非凡的传教士调查记录和早期汉学写就的地理、历史和人群之风俗²。

随着抗战开始以及大量的学术机构向内地迁移，作为整个抗战后方的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与传统的边地有所区别。向边疆去和建设后方的情势同学者们在迁徙之后的学术转向重合，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 1940 年代展开的边政学问题。众多以边疆研究为学术专长，或关注边疆的知识人投入到这个学术名目的界定与争论当中。相当一批的学者也在政府中担当起了边疆政策的设计角色（王建民，1997: 265-275）。这种转向边政学的现象为我们提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从彼此不同的研究传统进入到不同的边疆，对边政学赋予的意义和内涵有何不同？以边政学为一个思考框架，反过来对边疆或者说边疆研究的想象力有何改变？

近年来，学者们对“边政学”的历史进行了有效的讨论和材料积累（杨天宏，2010；汪洪亮，2014）。但在边政学成为中国学者所自觉采用的说法之前，这一领域的学者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边疆民族研究经历。从学术史上看，这些边疆民族调查各有其产生的思想与学科资源，而且其在此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继受和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别。仅存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边政学”之名，固然可以在历史语境下标识这些边疆调查和研究，但仍不足以揭示出这些调查研究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型在学术流变上的内涵。如何以学术史的眼光和方法来揭示边政学转向背后的中国学术生态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一些重要方面，在中国社会学史蓬勃的今天仍然是一项值得努力的尝试。本文试图从西南边疆调查和研究，特别是川滇地区在 1928-1947 年之间的变化，来进行学术史的尝试。

上述两个基本的情境中包含了两组学术史探究需要重视的关系：一则是边疆田野工作与族群及与国家观念之书写的关系，二则是边疆田野工作与学术范式转移的关系。在最直接的边疆民族

¹ 直到 1930 年代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学者仍将传教士的实地调查研究视为田野工作的基础，在对边疆民族进行族源考证的工作中，传教士的语言学考察更是被学者们和古代方志中的族名记载视为同类型的材料，例如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es）在云南考察时对云南非汉语人群的语言学分类，这种分类对此后重要的中国学者——如凌纯声、陶云逵和马长寿等民族学家以及李方桂和罗常培等语言学家——考察西南非汉语人群的语言学分类的影响，特别是“苗瑶”与“民家”的问题，见彭文斌（2007: 8）。

² 黄文山（[1936]2013: 237）很清楚地看到，传教士在明清之后的调查记录，直接影响的是如斯宾塞这样的普遍文明论者。如果按照黄文山的观察角度，如果经历了西学和现代社会科学体制的中国学者对上述传教士调查的对象重新观察和写作，是否能提供不一样的普遍文明论？我们是将这些作为田野工作之前不得已而存在的人文想象作为学术前史代替之，还是作为文明论的先驱对待之。

志与国家的关系中,发现和再发现边疆的人民和空间,不仅是国家之间竞争的产物(Febvre, 1973; Craig, 1984),反过来也推动了国家力量在边地的形成和扩展(Sahlins, 1989)。这种相互刺激的一个后果是瓦解了“自然边疆”背后预设的国界和族界的合一¹。以巴特(Fredrik Barth)为代表,关注族群的社会学家瓦解了将自然边界(地理和生态)作为“族界”的含义,由此对族群身份进行了新的理解(Brubaker, 1996; Adelman and Aron, 1999)。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费弗尔的影响,将边疆视为临近之族群、宗教、语言和生态竞争的结果(Barth, 1969; Cole and Wolf, 1999)。

如果从地缘政治中的国与国转到文明想象中的国家关系,那么对地理上的边疆的认识,也会折射出对文化中的他者的想象。例如,对罗马边疆的想象,构成了欧洲民族国家认识自身传统的一部分(Whittaker, 2000)。观察学术类型的内在视角就从这种想象边界之外的他者开始。不同的国族想象竞争的场域之一,就是对文明的他者的语言、人种和风俗的知识考察的竞争。这种考察产生于对边缘的田野和语文考察,也对边疆和族群的田野观察有最深的影响。对19世纪后几乎影响全世界族群分类的印欧语言学,来自人类学和西方中古史背景的学者致力于理解其中的德国浪漫派思想背景,以及法国思想对这一观念的批判(Bloch, 1990; Dumont, 1994: 57-65; 埃利亚斯, 1998: 第1章; Geary, 2002)。

上述两个视角构成了学术史上考察和田野工作相关的边疆民族研究的基本入手点。然而,整合内外视角要服务的根本问题则是,我们如何通过学术史的勾陈重建研究类型。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不断重返学术史的原因,是要获得对实质的概念与似乎熟稔的经验的新鲜感受,以及持续研究的动力,而不是囿于对学派和学人的定见,或是寻找“遗珠”的好古之学(antiquarianism)。因此,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学术史写作的方式——来整合上述两个基本的视角就非常关键。

从考察对象上来说,学术史的对象一定是在具体历史开展中形成的知识,但对这一时间性的对象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学术史写作的对象具有内在紧张。一方面,学术史的确非常接近以知识为对象的历史社会学考察,无论是从学术的从业人口入手,或者是从学科或机构的组织沿革入手,学术史的考察对象都是在特定时空中学术道路被走出来的轨迹。这种在高度有序的时间性的勾陈中恢复的是学术的日常生命,当然也包括在田野工作中最基础也最微观的行动。但极为日常或者微观的生命史并不意味着不可预见。就此而论,无论是聚焦在人,还是聚焦在物(学刊、系科、学社等等),对传记性的材料(biographic materials)的使用就非常关键(Lindner, 1996: 31-114; Abbott, 1999)。

但另一方面,学科史的对象又可以是非常具有时空错置性(anachronism)的理想和观念力量。这种学术理想固然和学术人物的主张大有关系,但也未见得是明确标榜的理念。它可以与同时代人互通声气,但也非常可能是从跨越时代的理念中找到灵感。我们如何对待一个时代的“预流”和“逆流”,如何对待面临大量外来观念和传统冲击下的反省,非常需要解放学术史在时空错置的观念交织中的想象力,也就是要将学术史写作中的“情景化”(contextualization)作更为复杂的架构,在学术实践的有序进程和概念的时空错置之间搭建有效的分析,使得学术史的转折,分期和类型化具备新意。在这个意义上,借鉴思想史的概念考辨来对学术文本加以理解和比较,是扭转学术史和学科史走向机械的情境决定论的一个关键(Ringer, 1969; Aarsleff, 1982; Pagden, 1982: 119-200; Olender, 1992; Lindner, 1996: 115-153)。

在以上的思考线索中,本文试图结合两个分析角度来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边疆民族调查何以构成学术类型。一方面需要对研究作品的文本进行比较。另一方面需要从研究开展的具体情境,特别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生平史中看到学术演变的动力。蔡元培论民族学的文字,构

¹ 从法国学界对费弗尔堪称经典的“自然疆界”研究《莱茵河》(Le Rhin: Problemes d'histoire et d'economie)的批评开始,萨林斯(Sahlins, 1990)详细讨论了十七世纪当中致力于建设“自然边疆”的政治理论是如何展开的。

成了观察这一学术类型的着眼点。

一、

蔡元培振作民族学的想法，可以在他 1926 年冬发表在上海《一般》杂志上的《说民族学》（[1926] 1962）一文中看出来。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的重点是将民族学和人类学加以区别。民族学以共享文化生活之民族（Folk）为对象，因此可以说是对各民族文化的比较之学，而人类学则是以人的生物构成（体质）为前提的研究¹。1930 年蔡元培在中国社会学社上致辞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则将民族学和社会学视为文化-社会比较的“原初”与“发达”两端。但这两端都是置于当前历史，而不是考古式的研究。事实上，在清末至蔡先生发表两文之前的十余年当中，从丁文江 1914 年在四川和云南进行的体质测量开始，到李济归国后的人类学尝试，及至蔡元培推荐出书的俄国学者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由体质测量进而辨析人种都是最主要的民族学形式（王建民，1997：85-89）。尽管蔡元培两文秉持的民族学概念极受 19 世纪德语学界的民族学或东方学的影响，但它们提出了将民族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加以区分的第一个说法，其将民族（folk）与人种（race）加以区分的做法与此前中国学者（例如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1903）将民族学与人种志混用的做法有了明显的区别，而这三个学科正是在战时中国非常关键地塑造了边疆调查实质的学术脉络。

蔡元培的学科区分，在他直接推动成立和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的学术门类里面更是看得清楚。1927 年，蔡元培兼任筹备中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的民族学组长²。次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将研究西南的苗、瑶族放在最初的计划之列³。德国学者颜复礼（Fritz Jaeger）和在北大从莱辛学者欧内克（Waldemar Oehlke），担任史语所特约编辑的商承祖（章孙）即在这一年前往广西凌云县调查瑶族的生活和文化状况。7 月到 8 月，两人在凌云县的北部调查了 6 个瑶族聚居的村庄。在蔡先生的支持下，这次调查后写就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成为“中研院社会科学所专刊”的第二号在 1929 年出版。对这个报告兴趣最大的是刚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萨丕尔（Edward Sapier）拿到博士学位的李方桂。1929 年入职史语所后便着手西南的壮-侗语言研究的李方桂随后写了《广西凌云瑶语》一文（李方桂，1930），试图证明瑶语更近苗语，而不是如颜、商二人认为的那样近泰语。

就在颜、商二人在广西山中开展调查的时候，影响早期中国边疆社会研究甚巨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在 1928 年 7 月成立于广州。人类学与民物学组是该所初设的八个组别之

¹ “比较”在 1936 年凌纯声的解释当中更是民族学与民族志区分的关键，而凌纯声也完全赞同人类学的体质含义，将美国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等于欧洲大陆的 Anthropologie，参见凌纯声[1936]2003:2-3。陶云逵的民族与人种之区分（[1936]2011:115-116），也与此意相同。而马长寿在《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一文（[1947]2003：2-3）中很敏锐地指出，人类学被视为初民之学，而和研究文明化国家之组织之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区分开，很受凡尔赛体系后将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的影响。但马长寿因此认为将“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变为“俗民社会”（folkway society）可以说是西方人类学内部针对上述不当的文明划分的一个回应（类似观点参见）。但对初民 vs 文明化的区分的真正质疑，不是针对进化论的批判，而是两种普遍历史之间的紧张，即按照人种-语言志将人类普遍划分的“自然历史”和按照宗教与政治划分“文明传统”这两种历史观念之间的紧张。自然史的现代版本，强烈质疑了文明传统建立起来的整合力与制度价值，参见 Momigliano，而不是即不是自认为历史顶端列强和无法进入普遍历史的“初民”之间的紧张。这一点，无论史在西方学术史的内部，还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内部，都有很多再讨论的空间。

² 根据 1927 年 7 月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时为大学院的附属单位的中央研究院准备下设社会科学研究所，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天文台。社会科学研究所实际成立于 1928 年 3 月，杨端六成为首任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社会，法制，经济四组。这一个结构持续到 1932 年 5 月因为经费问题而取消，参见《中研院二十一年年度报告》，第 321 页。

³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

一，而史禄国被聘至该组主持研究。同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则在半年前就成立了和史语所名称相仿、学术旨趣接近的语言与历史研究所（语史所、杨成志，1931）。两所机构对边疆研究的共同期待在1928年的夏天迈出了第一步：史禄国夫妇和两位年轻的广东学者容肇祖与杨成志一起离开广州向西。他们准备取道河内，前往云南进行边疆调查（杨成志 [1930a] 2003）。此时，距离史禄国第一次到北京从事研究已经超过了10年，他关于通古斯的研究也在四年前出版¹。在和西伯利亚与中国的东北迥异的西南，史禄国一方面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另一方面也准备完成地方文献的搜集。如果两方面的计划实现，史语所和中山大学共同期待的边疆调查也许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在昆明停留了月余之后，容肇祖带着他搜集的地方文书材料返回广州，此后写作了未曾公开发表的《云南种族及民俗调查报告书》（王传，2015：13）。史禄国夫妇则在昆明完成了体质测量后，找到了居住在昆明的一家四口的傩傩族人，对这家人进行了语言学，特别是发音的观察和记录（Shirokogoroff, 1930：183）。史禄国没有再继续前往计划中的云南东南部，而是返回了广州。他在昆明的语言学观察后来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一卷第二分本上，名为《记猓音》（Phonetic Notes on a Lolo Dialect and Consonant L.）。

这一行中最年轻也最固执是杨成志，他9月独自从昆明继续向北，10月抵达了凉山²。此后的2个月里面，他结识了彝民首领，在上百个彝族村落里面开展了他第一次长时间的西南边疆调查。在《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于1929年初出版的时候，杨成志则在凉山下的巧家县开始学习彝文。流过四川、西康和云南的金沙江西岸开始慢慢变成了他脑中清晰一点的民族志田野。1929年5月，他在对西南民族的方志又做了一番考察之后，决定在未来四年内对云南全省进行深入的调查。可惜，他最终没有得到想要的入滇经费，1930年3月经河内、香港返回广州。

在杨成志1年8个月的田野跋涉中，早期边疆调查的局面发生了从南到北的变化。史禄国中途返回广州后，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合作而专事史语所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工作。1929年5月迁往北平的史语所将原来的8组减为3组，人类学和民族学被放在了李济领衔的考古组之下。傅斯年并不希望这部分工作就此停止，仍让史禄国实际主持史语所留在南方的这部分工作（王传，2015：10）。但从史语所北迁到史禄国1930年北上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堪称中研院边疆调查最有活力的部分。

在社会科学所发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的前八号（1929-1933）中，边疆民族调查占到了半数，除了上文提到了颜复礼、商承祖的广西瑶族调查（第二号，1929）之外，还有中研院特聘的民族学家林惠祥的第一部民族志作品《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第三号，1930）和任职同济大学的德国医学家史国博（H. Stiibe）与同济学生李化民用德文发表的对浙江景宁畲民的调查报告，《浙江景宁敕木山余田民调查记》（第六号，1932）。而《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的前三号作品中有两部是边疆民族调查的成果：除了陈翰笙主持写作的《难民的东北逃亡》（第二号，1930）

¹ 在俄国中亚与东亚研究所的资助下，史禄国夫妇在1919年11月24日抵达北京，参见《史禄国1917-1918活动总结报告》，袁剑等译，感谢袁剑兄慷慨分享译文。1923年史禄国发表论文《中国北方之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Extra Vol. II.）其中的体质人类学区分令中国早期民族学学者印象深刻（黄文山[1936], 2013: 238）。史禄国关于满洲社会组织的著作1924年在上海出版（*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Extra Vol. III.），对中国学者的影响更为直接，参见吴文藻在《社会学刊》，第五卷第一期的评论。1925年，史禄国利用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进行的体质测量，出版了《华东和广东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 and Kwangtung Province*）参见王建民（1997：88）。

² 9月1日，杨成志从昆明向滇东北进发，经大板桥、杨林、羊街、功山、钢厂、痢头坡、鹧鸡、东川等地，历时半月，抵达金沙江畔的巧家县城。之后，他在熟悉彝情人士的帮助下，沿着金沙江步行3天至大田坝，乘木舟过险江，到达凉山脚下的一处名为六城坝的县佐驻地。杨成志在自述中说（[1930a]2003:8），“我的目的想把川滇交界沿金沙江西岸长凡二千余里，宽约三四百里，汉人呼为‘蛮巢’，外国人称为独立罗罗的巴布凉山做一个详细探讨的。”

之外，还有中研院委托林惠祥将卢作孚得自西康，于1929年赠予中研院的彝族器具进行说明所得的文字《猓猓标本图说》（第三号，1931）。

1920年代末加入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两位年轻学者陈翰笙与凌纯声以各自的学术路径，进入了东北，并在那里开辟了边疆调查的新局面。1929年的春天，提前结束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陈翰笙转到了同在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年夏天，陈翰笙组成的调查队伍前往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进行调查。从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专刊和集刊上的调查报告来看，调查的主要动机是东北的农业经济和从河南、山东等地流落到东北的难民问题¹。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并不是调查者在当地的深入访谈，而是较为系统的基于文献的经济趋势分析。陈翰笙带领的研究者除了接触辽东省铁路经济局的调查资料和档案资料，也广泛利用了国外，特别是日文的社会经济调查资料以及当时中国报刊所见的难民报道。在危机日盛的东北，陈翰笙的调查报告可以说是出色的文献研究（library research）。系统融合档案与传播文献的调查报告在陈翰笙这段时间主持的两项东北调查中非常一致。而同一时期由他在无锡和河北主持的农村调查则有明显的区别。

1930年4月，入职社会科学研究所不到一年的凌纯声携商承祖一道赶往东北，进行满族-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调查，调查路线为松花江下游及同江至抚远段黑龙江沿岸地带，即赫哲族的主要分布区域。这三个多月的调查产生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四）。和凌纯声一样深受莫斯（Marcel Mauss）与葛兰言（Marcel Granet）影响的徐益堂曾认为这个民族志重族群资料而轻地理，并且对方志材料采纳不够（转引自黄文山，[1936] 2013:240）。但这一民族志事实上成为中研院边疆调查的新起点。

赫哲族调查结束后，凌纯声成为中研院边疆调查最活跃的学者。1933年的初夏，他和三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芮逸夫以及负责技术的勇士衡从南京出发，溯江西行，从武汉和长沙转道沅江前往湘西进行苗族调查。在湖南的凤凰、乾城和永绥三县交界的地区，凌纯声等人完成了三个月的“内边疆”调查²。

就在凌纯声等赶往湖南后的一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杨杏佛被暗杀的事件加速了该所的改制。当凌纯声和芮逸夫从湖南返回南京的时候，社会科学所内的学科组已经开始裁撤。某种程度上，这是该所从1929年开始陷入缺乏核心领导局面的结束。机构变更和随后的学人流动，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史语所共同从事边疆民族调查的局面结束，而这两个所也都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研究重心。

在丁文江和北平调查所陶孟和的协商之下，继续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支持的北平调查所在1934年的7月变为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原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的集刊和专刊在合并前后停刊。而北平社会调查所此前主持的两份刊物，《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创刊，每年一卷分四期出版）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创刊，每年一卷，分两期出版，193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成为合并后主要的刊物。此外，社会调查所原本主持的专著系列“社会研究丛刊”则在合并后被新启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取代，第一本著作作为吴承禧的著作《中国的银行》（1934）³。

如果我们对比完全由北平调查所主持的“社会研究丛刊”（截止到1934年）和合并之后开启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两个系列的出版物，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感受到改组带来的学术转向。“社会研究丛刊”主要刊载的是以著名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为代表的一系列生活调查，

¹ 除了《难民的东北流亡》外，还有陈翰笙，王寅生著《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中日俄记载中中国黑龙江流域农民地主农业经济概况》，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的第一号（1929）。

² 在他们返回南京之后，两人在调查中结识的石启贵继续在湘西的田野工作，参见石启贵（1986）。

³ 参见《社会调查所第八年报告》，载《民国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卷29：453-454。此时，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北京和南京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查已经备受中国学界瞩目。改组之后，新的社会科学所分成了北平和南京两部分，1935年初全部迁往南京。

既包括研究发现，也包括生活指数的编算办法。陶孟和与他早期的助手樊弘、杨西孟是以进步主义时代盛行的“账簿法”进行的细致调查为代表作品。而“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中，这类以家庭支出为基础的微观调查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类基础研究：国民经济的统计（特别是和国内外贸易与工业化有关的统计和估算）以及中国经济史研究。

《社会科学杂志》的生命则跨越了这次机构的调整。它早在北平社会调查所从纽约宗教调查部独立之后就开始刊登文章，到1937年因为抗战停办，共出版了8卷31期。这本期刊涵盖的学术范围要比上述两个专著系列都广，但大体上分为三类：国民经济指标的统计报告（包括估计）¹，经济理论和统计办法的简介²，以及中外经济史的研究³。如果算上外贸统计，经济统计类的作品占据了第一大类。很明显，在这个期刊当中，接近生活指数调查或任何微观社会调查的作品仍然是极少数⁴。换言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在独立后其实高度转向了国民经济统计和贸易研究，而非陶孟和此前领导的以劳工生活调查为重点的社会调查。对国民经济的统计，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的统计，是和陶孟和年纪相仿、经历相似的早期中国政治经济学和公法研究者在20世纪头20年非常关心的主题⁵。对贸易和工业化的关心，对统计海关数据，对货币情况的分析等尝试在时间上也和中国经济学在20世纪的第一次高峰重合⁶。

社会科学研究所1934年之后真正的新转向是受整理清代大内档案激发的经济史研究。这一变化，除了陶孟和的见识之外，也和调查所从1930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大有关系。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湖南学生汤象龙成为首批研究生中的一员。两年后调查所则招收到了整理和研究各省厘金档案的罗玉东、1933年离开北大经济系的青年学生千家驹，以及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梁方仲和巫宝三成为又一批的研究生。新的史料和社会调查数据使得中研院的社会研究产生了实质上的新学风。这些利用经济史材料整理中国史的年轻人推动新的社会科学所走上了社会经济调查与新的经济史并行的道路⁷。“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这个系列的出版物中真正和工业、贸易与货币等国民经济学统计并进的，正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作品⁸。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激发的史料与史学变革，到1940年代已经扩展至了更为广阔的明清以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⁹。

陈翰笙在“杨杏佛事件”之后离开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正式去职之前，他在1933年5月加入了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和马寅初、陶孟和等一道成为该农村政策研究机构首批聘任的学

¹ 如陈翰笙第一卷1期，《山西的农田价格》；吴铎，第一卷2期，《最近二年来我国政府劳动设施之概略》；第二卷2期，王世达，《最近十年中国的人口估计》等。

² 如第二卷第1期，刘心铨《工资指数编制方法：一个讨论》；第二卷第3期，裘开明《按表亲查法在农场经营研究上之应用》；第三卷第1期，杨西孟《统计学中分割数的问题(附图表)》。

³ 如第一卷第3期，汤象龙《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第二卷第4期，汤象龙《道光朝捐监之统计》；第四卷地4期，王镇中《大战前日本棉纺织业在华贸易之发展》等。

⁴ 比较接近社区民族志的可能算是《北平协和医院的卫生试验区》。仅有第一卷2期，陶孟和写的《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类似《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中收录的，以家庭账簿为基本调查媒介的经济调查其实非常少见的。

⁵ 我们可以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出版系列“历史，经济学与公法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上面刊载的1891-1923年间的博士论文可以略窥一二。按照当时哥大博士论文需要出版的要求，这个系列刊载了大批研究中国的题目。

⁶ 参见郑娟，梁捷：《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67。

⁷ 就在改组的当年，在社会调查所接触了清代经济史料的年轻学者汤象龙，梁方仲，罗玉东等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在史学界强化了这一经济史的新趋向。而陶孟和和汤象龙则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这一和《食货》齐名的经济史杂志。抗战之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也成为陶希圣在北大领导的“食货”学派并驾齐驱的经济史研究群体，参见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51年撰写的报告 *A Survey of Recent Studies on Chinese Economy: 1927-1947*，第14-15页，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subseries 601s，Box 51，Folder 41。

⁸ 包括罗玉东著《中国厘金史》；余捷琼编《1700-1937年中国银货输入的一个估计》。

⁹ 社会科学研究所抗战后颠沛流离，在1940年到达四川宜宾县李庄时安定下来，而就在李庄较为稳定的6年当中，严中平的棉业史研究，梁方仲对明代一条鞭法的研究，罗尔纲的晚清兵制研究和更为年轻的李文治的晚明民变，和彭雨新的田赋研究都陆续展开，构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者。在农村复兴委员会主持的第二批分省调查中，如何在“九一八”之后认识和开发西南边疆的意识更加明确。而奔赴广西和云南的调查者使用的正是陈翰笙设计的调查方案。从各省调查报告来看，此前在东北调查时候形成的融合文献研究的特点则逐渐消失，这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更紧密地从经济史考辨入手理解社会经济问题的倾向形成直接的对比。

当时几乎所有关注工业化问题与农业经济前途的学者都采取了社会经济调查的形式来进行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4 年之后与何廉、方显廷领导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路径非常一致，都强调从经济史和工业调查的结合入手进行国民经济的研究，一方面清理现行的公共数据，另一方面以地区和行业为基本单位进行个案研究¹。而陈翰笙此后的经济调查不仅淡化了此前有过的经济史痕迹，也不再明确的社区单位的原则和社区比较的内容。某种程度上，这是早期陶孟和式的社会调查在农家经济领域的继续。

二、

1934 年的调整使得社会科学所和史语所的研究取向有了非常明确的区分。凌纯声、芮逸夫和陶云逵成为史语所中的人类学组成员。这个团体也构成了中研院边疆民族研究的中心²。就在这一年，在巴黎获得博士学位的杨成志返回了学者生涯起步的中山大学，但没有回到启发他田野工作的川康之边。不过，在他返回的时候，这个被西南的巨流和峻岭南北向开出的通道，已经开始成为 20 世纪中国学者边疆民族调查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战时中国的学术历史上，这个区域大致被分为了川-滇与川-康两个亚区³。史语所的民族学者从 1930 年代到抗战转移后所带动的调查，使得川-滇地区民族志作为学术类型开始成型。

在凌纯声和芮逸夫辗转于浙江的山地时，淞沪会战迫使他们供职的史语所从上海迁到了南京。在鸡鸣寺路落户的史语所迎来了战时边疆民族研究最杰出的学者之一陶云逵。对中研院的边疆民族调查来说，陶云逵和一年后入职史语所的吴定良令人类学组名副其实，更让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架构起了从语言、体质和社会结构考察边疆与民族的研究能力。1934 年的秋天，刚刚加盟史语所的陶云逵与大他两岁的常州同乡凌纯声一起承担起了史语所与云南省政府合作的云南省内调查。五年前杨成志立下的调查云南全省民族的宏愿在陶云逵和凌纯声的滇南、滇北两路调查中展开。凌纯声仍和勇士衡搭档，在南至河口、麻栗坡、蒙自、金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主要考察边民之生活习俗与社会，调查对象包括摆夷（傣族）、麽些（纳西族）、傈僳（彝族）、傈黑（拉祜族）、傈傈、卡多（哈尼族）、扑拉（彝族支系）、茶山（景颇族）、崩龙（德昂族）、阿佤（佤族）等。陶云逵与赵至诚（史语所技术员，负责摄影、绘图）一路，调查区域上，东南至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冲、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重点考察民族体质、语言，调查对象有民家（白族）、麽些（纳西族）、傈傈、窝泥（哈尼族）、摆夷（傣族）、曲子（独龙族）、怒子（怒族）、傈黑（拉祜族）、阿佤（佤族）等民族（李东晔，2011：5）。

1934 年，驻缅甸的英军在云南开矿被云南土司、班洪王联系其他部落所抵抗。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西南边疆最有雄心的调查恰与中缅边界南部未定界发生的“班洪危机”同时⁴。冲

¹ 根据方显廷的回忆（方显廷，2006:71；83），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工作，是以行业为单位，在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进行个案研究。

² 1934 年 5 月，在社会科学研究彻底重组之前，湘西苗族调查的三人再度出发，去往 1929 年两位同济大学学者曾调查的浙江畲民地区，根据这次调查写成了《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

³ 关于这一时期的川-滇区域，参见杨成志（[1930b]2003：49）。关于此时的川-康区域，可见马长寿（[1946]2003：216）。陶云逵对云南之民族地理的分布（[1936]2011:124-141）和凌纯声（1936）颇多接近。

⁴ 班洪危机的简介，参见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周光倬的报告书（[1935]2014）和张诚孙（1937）。

突的发生强化了国民政府对中缅边界南段的考察和勘定的决心。外交部求助于中研院加强中缅边界的民族识别工作。凌纯声和芮逸夫在军队的护送下与中英双方代表抵达滇缅边境。从 1935 年底到 1936 年 4 月，凌纯声和芮逸夫带领勘察人员先到镇康，然后到达孟定、耿马，之后再回到孟定，再南向到达勐董城。史语所的民族学家一路协助记录与识别中缅边界地区分布的各个民族（王明珂，2008）。史语所学者和勘界官员以及地理调查学者至此汇聚到晚清光绪年间搁置的中缅边界南段。班洪危机没有太大的影响陶云逵按计划开展的南线调查计划。他的田野调查在 1936 年春天结束¹。

相比起对赫哲族的调查，云南调查似乎对中国的边疆和民族学界的回应没有那么响亮。但它却使得史语所成功延续了自建所以来的边疆民族调查传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民族学组的工作和史语所同时期开展的语言与体质研究呼应起来²。1937 年秋，史语所离开鸡鸣寺路，和众多中国大学一样开始了西迁。在离开南京之前，川-滇调查在抗战前的最后一次重要的田野工作，由毕业不久的马长寿来主持³。

筹备中的中央博物院聘马长寿为助理研究员，他在 1936 年开始了西南民族调查。这项由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织的项目与史语所的云南调查前后相连。马长寿、赵至诚、李开泽（文书、会计）三人组成的考察团于当年 12 月 19 日从南京出发，次年初抵达了成都⁴。和史语所的云南调查一样，马长寿主持的川康调查也分成了南北两路：北路由灌县至汶川、理番、茂县、松潘考察羌民、嘉戎、西番，南路由宜宾入凉山转至西昌、盐边、盐源、会理，考察罗彝、麽些、傈僳、彝夷、苗人等⁵。川康考察团首先考察的是凉山罗彝。1 月 14 日，在四川建设厅 2 名人员陪同下，马长寿等三人从成都出发，抵达宜宾，沿金沙江西上，于 1 月 23 日抵达屏山县城，开始调查罗彝，调查至 6 月 17 日他们离开汉源县止，共在彝族地区停留 145 天。

南京陷落与学术机构内迁，暂时打断了马长寿计划中的北线调查⁶。马长寿将重心再放回到了凉山。1938 年 12 月，他前往越嵩县田坝进行田野工作。和上一次的凉山考察不同，马长寿在越嵩的调查采取了深度的田野观察的形式。在越嵩河西畔之斯补、尼帝两个土司区域，集中做社区研究。从 10 日到达斯补勒陀开始，到 1940 年 4 月 5 日离开，共计 115 天（马长寿，2006：1-3；71-75）⁷。马长寿在乐山写成了他凉山考察的卓越民族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

1941 年，在史语所再次因为战火离开云南并落户四川宜宾李庄之后，川-滇的调查才真正恢复。1942 年底，芮逸夫和就读于史语所的硕士生胡庆钧离开李庄，前往川南的威信县和叙永县进行苗族调查。在叙永县南部的鸦雀苗区，芮、胡二人作了历时一个月的初步考察，观察了十几

¹ 陶云逵抗战后离开史语所，辗转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母校南开大学，在南开他主持边疆人文研究室，直至 1944 年去世。云南调查奠定了英年早逝的陶云逵最重要的学术基础。其著作收入陶云逵（2011）和陶云逵（2017）两部文集。

² 原本在北线调查的勇士衡在 1936 年后又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云南各地补充调查。勇士衡的调查路线为昆明、蒙化、蒙化、临沧岩帅、双江猛库、墨江、西双版纳、车里，见史语所对调查路线的图像化，参见网站 <http://gissrv5.sinica.edu.tw/mi/>。

³ 在此期间，史语所的西南调查除了石启贵 1938 年在湖南苗区的继续调查之外（参见石启贵，1986），还有芮逸夫 1939 年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与布依族调查，参见王明珂（2008）；杜臻（2015）；黄克武（2016）。不过，从奠定川-滇调查的基础作用来讲，马长寿的凉山罗彝调查成为关键。

⁴ 参见王欣（2013）。

⁵ 参见马长寿（2006，第 1-3 页）；王欣（2013）。

⁶ 在南线的调查计划结束之后的四十多天里，马长寿在成都整理调查资料。8 月 3 日，考察团按照原计划进行北路调查，不过，因为南京的陷落，马长寿的调查主要是在岷江上游进行，于 12 月 21 日回到成都，参见马长寿（2006：73）。

⁷ 在这段时间川康边区考察在 1930 和 1940 年代的政学两届得到了很多的关注。1938 年，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总干事长杭立武拨款组织“川康西南西北之科学考察团”，聘请学者和大学生准备前往川康调查。1939 年，中英庚款资助下的“川康西南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四川乐山成立，邵逸周任团长，参见汪洪亮（2014:285）。

处苗人生活（刘芳，2010；芮逸夫，2010）。1943年初，两人分开，芮去海坝乡南凹田，胡去峰岩。胡在结束调查后，回李庄进行硕士论文写作，芮则到大树乡，搜集婚丧礼俗资料，工作40天后，去东部落窝乡、西部大坝乡、古宋县境内的白苗进行调查。5月中旬，芮逸夫结束川南叙永苗族考察，在泸州蓝田坝返回李庄。随着陶云逵和凌纯声先后离开史语所，芮逸夫的调查可以说是史语所创建川-滇民族志类型的节点。中研院自1934年改组社会科学所，促使民族学的研究力量转移到史语所之后的十年，在芮逸夫的调查中画上句号¹。

先后进入到这片地区的杨成志、陶云逵和马长寿都尝试用“西南民族”来讨论自己的田野工作。熟悉西方传教士调查与包含汉学在内的东方学研究是上述西南边疆调查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将中国正史和方志中的西南族群记述与汉学和传教士文献对照，是边疆研究考察族群区分的基本手段（马长寿，[1936b]2003:50）。杨成志1933年在法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上的报告，以《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为名发表于《禹贡》（杨成志，[1934]2003）。在文中，他并没有展开对西南民族的界定，而这篇长文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而是异常博学地讨论了古史，尤其是东方学文献中的罗罗史传。

陶云逵宏阔的比较文明视野和清晰的社会分析能力，首先体现在他如何极简地定义云南的边疆民族特性上。他首先将云南视为藏传佛教和小乘佛教传播造成的文明接触带（cultural marginal area，[1941]2011:96）。这一点和马长寿对西南民族的界定如出一辙（马长寿，[1936b]2003:49-50）。其次，陶云逵将一般意义上的中原-边陲关系（即通常所谓的汉化）拆解为建政（“中原化”）、同化（汉族与非汉族的相互涵化）以及分属不同语族的非汉族群之间的转化等不同的族群关系（[1941]2011:97-98）。最后，陶云逵非常简洁地指出，云南最宏观的文明化进程（即宗教文明的分殊）和包含不同机制的汉化进程的交错，使得云南内部的亚区没有沿着宗教边界分开，而是在汉化明显的滇北和不充分宗教化的滇西、滇西南和滇南之间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这个空白地带，实际代表着云南的“土人”，或者说“前中印文化层”（PreSino-Indic Culture Stratum，同上书:100）的特点。研究云南在族群意义上的特殊性即在探索此中间地带的构成与演变。

历经坎坷，在2006年方始出版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代表了马长寿最成熟的田野工作，在这个民族志完成的部分中，我们清晰看见对田野观察材料（实物、访谈和仪式观察）、文献材料和口传材料（神话类型）三种类型的研究对象充分的探究。这种分析在他此前充满莫斯气息的关于“花甲生藏”之缘起和类型比较的文章中已可见到基本的构架（马长寿，[1936a]2003）。该文的田野工作部分主要是他在山西昔阳县对口传资料的整理和当地出土墓葬（第八、第九节）的考察。但其对民俗和神话类型的娴熟比较，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莫斯在其名著《礼物》的第一章的描写。

从史传中讨论族群分类，马长寿心中最完美的标准是将经济、政治和习俗结合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后者将“西南夷”分为“耕田民族”“随畜民族”和“半耕半猎”民族。而正史中对西南族群分类的关键转折在范晔的《后汉书》以“蛮羌夷狄”四个基本类别来统摄更为纷繁，与具体的地域和文化关联更紧密的族类（马长寿，[1936b]2003:51-53）。“四夷说”的形态，奠定了后世史学书写族群的典范，但在马长寿看来则是对《史记》简单而深刻的写作形式充满遗憾的背离²。马长寿的意思是，正史叙事的优点，不在于能科学地界定族群，而是提供了合理的

¹ 1962年，在管东贵的协助下，芮逸夫此次调查的民族志《川南雅雀描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作为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三正式出版

² 因此，他眼中魏源只是根据有无地方君长而将“西南夷”分为“苗”（无君长）和“蛮”（有君长）的做法是更成问题的。比较杨成志（[1930]2003:140）对此“四夷说”基于华夷史观的批评，可知马长寿对古史体例内在的变化还是有所察觉的。胡鸿（2017:116-162）对四夷说的形成通过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

“亚类”。

早在 1936 年，徐益棠就将马长寿的分类与西南民族调查的先行者丁文江的四分法进行了比较，认为都是在大规模体质测量不可能的情况下而不得不从语言学分类着手的办法（徐益棠，[1936] 2002:152-153）。但马长寿从一开始很明确了史志记载与语言学分类结合的必要性¹。他对西南民族分类的讨论，主要是非常细致地论证西南民族三分法的框架对于可知的各个族群的适用性²。他对方志中的语言和体质记载的娴熟掌握，和杨成志对东方学文献的梳理可谓相映成趣。如果我们将马长寿对西南民族源流考证的文章放在一起，我们发现，马长寿结合了可靠的体质材料之外的几乎所有类型分析，从神话谱系到民俗传播的辨析，但和同时期写作《中国民族史》的林惠祥相比，马长寿的重点并不在于古史民族和现代民族的复杂对应，而是将古史民族中的族名作为“亚类”，进行进一步的类型划分。

而马长寿从《史记》中读到的合理的亚类，也正是他曾经的西南调查同事凌纯声和芮逸夫在 1940 年代后的关注焦点。芮逸夫（[1942] 1972: 3）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将中华民族作为具有“达名”的类，而各个具体的民族则是作为“私名”的类或者“次亚类”，而两者之间的以生态（如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和广义上的文化（如佛教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界定的类别，则是作为“类名”的“亚类”。那么马长寿在《史记》当中读到的“西南夷”三分法，正是芮逸夫在此文中用力最多的“亚类”。凌纯声分述“中国边疆政治制度”的若干文字，也是尝试用历史上的“边政”来充实他所谓“边疆民族”和“边疆文化”这一亚类的内涵³。

除了对历史上的治理制度没有详细考辨（马长寿 vs 凌纯声）之外，马长寿与凌纯声及陶云逵的一个明显差别是对族群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没有那么敏感。而凌与陶重视这一分布的原因是希望解释地理分布，特别是垂直分布的差异，究竟只是不同族群的生态适应性上的差别，还是有“民族强弱不同而生的社会选择现象”（凌纯声，芮逸夫，[1947]2003: 第 2 章；陶云逵，[1936] 2011: 136-141）。也就是说，这种对生态适应区（ecological niche）的具体解释，不仅关系到族群社区之间的分界，也涉及这种分界在时间中随人群迁徙和竞争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前者和艾克瓦（Robert Ekvall, 1939）在甘肃藏边进行的人文生态学民族志非常接近。而将共时和历时性的关系结合起来，则是人文生态学更直接的体现，这在看上去最不像边疆研究的燕京社会学当中颇有体现。

三、

历史有些错位的是，选择回到燕京社会学继续工作的林耀华没有进入到吴文藻在昆明创办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工作站⁴。与燕大社会学素无渊源的陶云逵来到了“魁阁”。1940 年，离开学界入职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的吴文藻身在重庆，而他最出色的学生们则分属昆明和成都三所不同的大学。但在吴文藻看来，这些都不构成燕京社会学传统的转折⁵。在他眼中，燕京社会学 1938

书写比较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¹ “史志记载之价值直接可辩证语言分类之真伪，其功能远在诸文化物质之上”（马长寿，[1936b]2003: 51-53）。

² 马长寿的分类法，基本上为林耀华（[1942]2003: 223）所采用。

³ 这些文字包括《中国边政之盟旗制度》（1943）、《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1943）、《中国边政之政教制度》（1954），以上均收入氏著，《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凌纯声先生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78 年。

⁴ 根据林耀华自己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冈恩（Selskar Gunn）的信中，他在哈佛写完有关家乡福建的书稿之后的取向又二，一是回到北平，加入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这是受到了 1940 年 10 月正在哈佛的燕京大学洪业教授（William Hung）的支持，二是去云南，加入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工作站，参见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3。

⁵ 工作站 1942 年报告（洛克菲勒档案中心, 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4）页 6，吴文藻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申

年之后在西南和西北边疆继续发展的核心是基于田野工作的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 sociology)。这个路子因为能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工作,不仅适合战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将社会学的“专刊”(monographic)方法与功能主义结合起来,使得个案的类型化具备了最高的学术价值¹。吴文藻亲自指导的工作站在1938-1941年的代表性成果当属费孝通和当时在燕京大学攻读硕士的李有义在禄丰县的禄村调查(1938年开始)²。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张之毅于1939年在易门县的“易村”进行手工业调查,1940年在玉溪县的“玉村”进行的农业和商业调查,李有义1939年夏天在路南县的“尾村”进行市场和交易调查。更年轻的史国衡和田汝康1941年也开始了新的研究。在吴文藻看来则是更为成熟的“专刊”社会学在非汉语人群(non-Sinitic)社区中进行的尝试³。

日军对越南的占领和中国远征军的开拔使得云南工作站的民族志社会学非常紧迫地面对了真正意义上的边疆问题。工作站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都被期待着像几年前的史语所同行那样,用自己的调查来清晰地呈现边境的族群和劳工状况,以此协助恢复云南到缅甸的交通,以便远征军顺利通过中缅边界⁴。1943年,入职成都燕京大学的林耀华在大小凉山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边疆田野工作⁵。他和杨成志在同样的地方开始了边疆调查,他先去凉山,再入川康北部调查嘉戎藏族的计划和几年前马长寿的调查路线几乎一致。1943年的夏天,林耀华带着学生胡良珍离开成都,经过宜宾县、屏山县,最终到达属于小凉山的雷波县,在那里开始了50天的田野工作(整个旅程88天)⁶。1945年,林耀华在当时任教成都的燕大同事李方桂的帮助下写成了英文文章《傈僳族的亲属体系》⁷。

非汉语社区的研究对于吴文藻来说的确不是到了边疆之后的想法。吴文藻在北平燕大时候就设想是将非汉民族和汉族进行社区类型的比较(吴文藻[1936]1999:482)。这在燕大社会学南迁之前的代表作中就能看到:在费孝通和王同惠对花篮瑶的社会组织调查中,人口(人口流动和生育率变动为其动力)造成社会密度的变化是边疆地区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杨庆堃以市集为对象的人文区位分析中,基层人口的流动方向和聚集模式则和分为“基本集”和“辅助集”的基层市集紧密相关⁸。

人类学史研究曾用“内在他者”(internal otherness)和“初民逻辑”(savage logic)这对著名的概念来区分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的德国人类学和英帝国人类学(Stocking, 1982; Proctor,

请资助的项目预算里面,将转移到西南的燕京社会学分成了云南和成都两块,云南工作站的部分为费孝通主持,在成都的燕京社会学则由李安宅主持,1943-1943年的财政预算中,云南部分的费用是19800美元,成都部分是12000美元。

¹ 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1944:3)将monographic sociology直译为“专刊社会学”,此说法的内容在吴看来,是对个案由功能联系起来的整体性作出描述。本文中仍使用吴文藻的译名。

² 费孝通和李有义在禄村的调查在1938年的11月到12月之间进行,1939年8月到10月,费孝通和张之毅和张宗颖进行了第二次在禄村的调查。1940年底,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在《社会学丛刊》发表。

³ 工作站1942年报告(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4)页2。

⁴ 工作站1942年报告(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4)页1。

⁵ 林耀华的博士论文《贵州苗蛮》虽然关于边疆但却完全是文献研究。因此,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项目推荐林耀华的Conrad M. Arensberg认为林耀华的博士学位是远东史(Far East history)而不是人类学,他和另一位推荐人,人类学家Carleton S. Coon都阅读了林耀华正在写作的《金翼》书稿,认为这个关于福建农村社区的研究异常精彩,并且对理解一般的农业社会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参见Arensberg和Coon1940年11月给林耀华的推荐信,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3。从1940年6月毕业到1941年底离开美国,林耀华在此期间的全部工作都是利用他在1936-1937年的福建调查时候获得的材料来写作《金翼》。

⁶ 林耀华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信,参见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21。

⁷ Kinship System of the LoLo, 参见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9。

⁸ 费孝通因此将杨庆堃这一研究和在云南的市集的研究视为连续,参见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box folder 215。关于早期社区研究人文区位论述,详见侯俊丹(2018)。

1988: 139)。套用这个概念，吴文藻设想的非汉语人群的社区研究，是一个社会化了的“内在他者”方案，因为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非但见不到德国人类学和东方学在处理“内在他者”时候的焦虑和自我投射（Marchand, 2009），甚至也鲜见蔡元培和凌纯声在区分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时候区分文明和自然的意图。马长寿关心的文明与文化的区分，似乎也不那么明确。

费孝通说得很坦率，他的社区研究设想之中的自然是自然史意义上的¹。研究初民社会的人类学提供了整体事实的方法，但怎么样能将之作为一种社会学来研究当下的中国社会，来对抗社会学按照某一类社会事实建立分支社会学的趋势，是工作站要解决的问题²。在村庄经济变迁研究中，费孝通试图将带有浓重芝加哥学派的“自然史”变迁（natural history change），也就是每一个农业村在土地和人口上的变迁，与结构变迁（structural change）结合起来。所谓的结构变迁，指的是农村社区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新的经济要素。因此，三村的一个比较维度在费孝通看来，是纯然农村社区结构与被手工业改变的农村以及被集体企业改变的结构，三者之间的比较³。费孝通执笔的《战时社会学研究报告》试图从两个方面细化前文提及的“民族志社会学”的基本内涵。一方面，工作站的村庄调查都是在“事实”（fact）而不是“事件”（event）的意义上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不是在占有具体历史时空的对象，而是在构成这些具体村庄的一般社会机制上进行的田野工作⁴。因此，费孝通认为吴文藻所谓的田野工作同时，也是社区类型化的工作，但如此形成的类型只有在比较中存在。燕大-云大工作站在社区研究的方法上仍自认为继续和完善了此前的人文生态的研究。从他们以田野工作成全类型化的思路来看，工作站的学者并不认为边疆改变了社会学的整体思路。这样的研究与陈翰笙聚焦在生产关系要素的农村调查仍有重要的差别⁵。

工作站于1942年3月连开了三天年会，对此前和此后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计划。不难看出，工作站代表的边疆社会学的确沿着吴文藻心中“民族志社会学”（ethnographic sociology）的方向前进，在社区研究中继续贯彻了类型化的方法论。在工作站第一波的调查中，村庄成为工作站调查的基本单位，而村庄的经济形态和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则是所有调查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村庄调查所发现的经济心态、交易行为和组织方式成为工作站的年青学者们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模式的起点。1942年的史国衡和田汝康承担着工作站下一阶段最有希望的研究计划：史国衡的劳工研究将要解释在熟练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云南的工厂是如何以师徒制来“再生产”有效的劳动力的。而在田汝康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摆夷的摆”研究中，宗教与“夸富”性的财物（they dispose their property ruthlessly in the feast）消耗的关系，被工作站的学者们认为是找出新的经济心态的入手点⁶。

¹ 费孝通的“自然史”说法，此时完全来自帕克：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7。他在1933年的短文《社会研究的程序》当中对这种自然史的倾向有很直白的阐述，他从流动和变迁中分出两途，一途为“历史”的途径，研究变成什么，这个是芝加哥学派最早的重要作品《波兰农民》之取法；二途为“历程”的途径，也就是帕克关心的从冲突到调节，从调解到同化的过程，参见费孝通（[1933]1999: 94-95）。这个过程不仅在《城市》一书的前言中被清晰提到，也被作为帕克的学生们的研究取向在城市民族志内外进行，例如Edwards（1927）；Thrasher（1927）；参见Abbott（2001:149-150）；Deegan（2001: 12-13）对此自然史含义的阐释。

²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页10，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5。这个观点在他的《乡土中国》后记中说得更加直白（费孝通[1948]1998: 89-91）。

³ 参见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8。

⁴ 参见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6。

⁵ 何谓聚焦在生产关系的要素，陈翰笙自己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985:6）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当时做的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第一二两种各自独立，第三、四两种则系补充性质”。费孝通（[1939]2001: 159-164）在《江村经济》中就陈翰笙将永佃制看作是历史上生产关系的遗存，而不是不在村地主（掌田底权）和本地佃农（掌田面权）之间的金融关系进行了批评，认为华东的永佃制说明的是资本倒流入农村的后果。

⁶ 对宗教的社会考察是以社区经济形态比较为基础的工作站研究的一个初步的转向。如费孝通所言，许烺光在大

因此，对吴文藻和费孝通来说，一方面，无论从社会构成还是从政治构成来说，边疆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这种完整的世界，并不是保留内地已经被现代化消除的本来面貌的“初民社会”，而在于其将内在各部分关联起来的功能结构。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的整体观不构筑在任何文明论的基础上，这个整体不是幽闭的，而要面对活生生的现代经济的变化，着眼于西南的政治眼光、口号和学术运动也构成了这个地域最重要的现在时刻。学者需要打破政治史的中心-边缘观念，重新构造各种比较类型，在新的知识视野中将边疆带回。

这个知识的判断也非常贴切地反映在吴文藻对《社会学丛刊》的设计当中。原本分为四部的该系列丛刊实际指只出版的甲乙两部，甲部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乙部刊载的是民族志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包括“乡镇社区实地调查报告”和“边疆社区实地调查报告”。“云南三村”的研究属于前者，而林耀华和田汝康在凉山与云南的民族志属于后者。

与吴文藻不同，李安宅和费孝通都感到历史对于民族志社会学提出的重要挑战。对吴文藻来说，历史研究根植于文化的时间性，因此历史研究与功能研究相辅相成（吴文藻，[1936] 1999: 488）。费孝通更想探索的是社会学所具有的一种很特别的历史意识。工作站对当代社会的聚焦，在费孝通那里是对“活着的传统”的聚焦，也就是说，是对被记忆留住的过去的聚焦（living past）。在费孝通看来，关注这种被记住而活着的现在，意味着同样关心对未来的期许（wishful）。社会学的“当下”，就是被记住的过去和想过的未来这两种意愿的投射（projection）¹。如何将清晰的“自然史”与遍布中国学术的历史感结合，这是战时的工作站没有想清楚的，但也许是我们通过这段西南边疆的学术小史可以继续探究的问题。

结语

杨成志 1928 年多少有些预期之外的凉山调查，开启了中国学者从蔡元培所期望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入手调查西南边疆的学术史。本文简述了 1928 到 1947 年的这段学术史中一些重要的时刻和事件，认为 1934 年的改组是原本合力进行边疆民族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史语所各自学术转向的契机。新的社会科学所开启了近代中国经济史的新方向，而接纳了民族学家的史语所则在西南，特别是川-滇调查中开启了史志与东方学文献对照，在“国族”与“族群”之间探索作为亚类的“西南民族”的独特路径。这个方向和南迁后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坚信立足于人文区位学是可以将边疆的非汉族人纳入社区比较的类型当中的。但这种民族志社会学深深嵌入到一种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自然史”观念中，其相信历程而不是历史的特点在费孝通那里构成了深刻但没有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从中外学术与思想史上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
- 蔡元培：《蔡元培民族学论著》，中华书局，1962 年。
-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 年。
- 费孝通：《乡土中国后记》，《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理的研究记录了也就是当地居民如何以医学和巫术并用的手段应对从缅甸传入云南的霍乱，这是对宗教进行研究的开始。在巫术，特别是巫医中看待地方宗教，后来在燕京大学的廖泰初教授于成都西北的崇义桥的服务站重点的内容。参见 The First Annual Report on the Work Done by the Rural Research and Service Station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Yenching University, 第 8-9 页，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21。

¹ 参见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7。

- 费孝通：《社会调查的程序》，《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
-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
-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黄文山集》，赵立彬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936]年。
- 蒋智由：《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1903年第37期。
- 李方桂：《广西凌云瑶语》，《史语所集刊》第一卷第4分本，1930年。
- 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
- 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
- 凌纯声：《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地理学报》1936年第三卷第3期。
- 马长寿：《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马长寿：《中国古代之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彭文斌：《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 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唐山出版社，1972年。
- 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11年。
- 陶云逵：《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11年。
-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人民出版社，2014。
- 王传：《史禄国与中国学术界关系考实——以“云南调查事件”为中心》，《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云南教育出版社，1977年。
- 王利平：《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建构：以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3期。
- 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 徐益棠：《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 西南边疆卷四》，马玉华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之发展》，《民族学研究季刊》1946年第5期。
- 杨成志：《单骑调查云南民族述略》，《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
- 杨成志：《广州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提要(书报介绍)》，《新亚细亚》1931年第一卷第六期，第145-148页。
- 杨成志：《我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
-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
- 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三联书店，2010。
- 张诚孙：《中英滇缅边界问题》，《燕京学报》，1937年。
- 郑娟、梁捷：《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一期。
- 周光倬：《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
- Aarsleff, Hans. 1982. From Locke to Saussure: Essay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bbott. 1999.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Chicago School at One Hund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bbott. 2001. *Time Matters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delman, Jeremy and Stephen Aron. 2001. *From Borderland to Borders: Empires, Nation States and Peoples in Between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Barth, Fredrik.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Bloch, Howard. 1990. "New Philology and Old French." *Speculum*, 65 (1):38-58.
- Cole, John and Eric Wolf. 1999. *The Hidden Frontier: Ecology and Ethnicity in an Alpine Val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raig. 1984. *Scholarship and Nation Building: 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and Alsatia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egan, Mary Jo. 2001. "The Chicago School of Ethnography."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umont, Louis. 1994. "German Ideology: From France to Germany and Ba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dwards, L. P. 1927.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bvre. 1973. "Frontière: the Word and the Concept", *A New Kind of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Peter Burke and translated by K. Folca.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 Geary, Patrick. 2002.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ndner, Rolf. 1996. *The Reportage of Urban Culture: Robert Park and the Chicago School*. Translated by Adrian Morr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chand, S.L. 2009.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Religion, Race, and Scholarship*.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lender, Maurice. 1992. *The Languages of Paradise: Race, Religion, and Phil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gden, Anthony. 1982. *The Fall of Natural Ma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octor, Robert. 1988. "From Anthropologie to Rassenkunde in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Bones, Bodies and Behavior: Essays on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Edited by George Stocking. Pp: 138-17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Ringer, Friz. 1969.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hlins, Peter. 1989. *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hlins, Peter 1990. "Natural Frontiers Revisited: France's Boundari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5)pp. 1423-1451.
- Shirokogoroff, S. M. 1930. "Phonetic Notes on a Lolo Dialect and Consonant L." 《史语所集刊》第一卷第2分本: 183-225。
- Thrasher F. M. 1927. *The Ga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hittaker, C.R. 2000. "Roman Frontiers and European Perception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13 No. 4: 462-482.

【论 文】

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共同繁荣的桥梁¹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与就业

马 戎²

摘要：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国56个民族和13亿国民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历史上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现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全面参与祖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从而掌握现代知识体系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大学生是未来一代国家精英，关心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就业，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要专题。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大学生就业

我国进入21世纪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各领域发展速度加快，但是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同步拉大，在参与祖国现代化发展方面的能力方面，我国主要少数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也在显著拉大。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16岁以上就业人口中，汉族从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比例是7%，明显高于维吾尔族的4.24%和藏族的5.09%。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2000-2010年期间，当汉族从事这一职业的比例从5.80%增加到7%，同期维吾尔族却从5.36%下降到4.24%（马戎，2013：3）。

在这样快速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者需要对各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步伐和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给予特殊的关注。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而接受高质量的、系统的学校教育，则是我国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实现这一理想的主要途径。

一、少数民族学生中的“民考民”和“民考汉”

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我国几个主要边疆地区（藏区、新疆、内蒙古、延边等）建立起一个与普通学校平行的民族中小学教育系统。长期以来，民族小学、民族中学使用当地民族的母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朝鲜语等）作为主要教学语言讲授各门课程（包括母语文、品德与社会、科学、历史、自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使用母语文各科教材，同时开设一门汉语文课，不同地区根据本地情况在初中或高中开设一门外语课（英语为主）。当地的普通中小学则使用汉语普通话和汉文教材来开设所有课程，同时根据本地情况在相应年级开设一门外语课。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学校入学，参加高考时使用民语文的各科试卷，被称为“民（族学生）考民（使用母语文试卷）”，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在普通学校入学，被称为“民（族学生）考汉（使用汉文试卷）”。尽管试卷考题的内容完全一样，但是由于中小学的母语文和汉文各科（数理化等）教材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是教材和教辅资料编写质量的差异，以

¹ 本文是作者2018年12月26日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学、社会学学部高峰论坛发言的修订稿，发表在《少数民族教育》2019年第2期。

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及部分任课教师教学经验方面的差异，“民考民”和“民考汉”考生的高考成绩差距显著。

为了保证“民考民”学生有一定的录取率，各自治区对这些考生分别采用了加分或降低录取分数线优惠政策。以2018年新疆高考录取分数线为例，“民语言”考生的文科一本录取分数线为418分（数学单科录取线31分），“汉语言”为500分，差距为82分，“民考汉”为421分；“民语言”考生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为327分（数学单科录取线35分），“汉语言”为467分，差距为140分，“民考汉”是398分（见下表）。由此可见，“民考汉”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高于“民考民”学生。因此，在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时，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民考民”学生。

分数线	考生类别	科类	汉语言	民考汉	双语班	民语言		蒙古 语言	
						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语言	数学单科限分		
									总分
文科	本科一批次		500	421	384	418	31	各批次从高分到低分，适当控制总分及单科限分	
	本科二批次		372	353	350	369	29		
	高职（专科）批次		200 （参考分数线）	200 （参考分数线）	200 （参考分数线）	从高分到低分适当控制分数			
理科	本科一批次		467	398	376	327	35		
	本科二批次		341	310	309	271	32		
	高职（专科）批次		200 （参考分数线）	200 （参考分数线）	200 （参考分数线）	从高分到低分适当控制分数			
体育类	本科提前批次 （本科零批次）	文科	82	参照汉语言计划执行	文科	81	文科		82
		文化课	165		文化课	165	文化课		165
	高职（专科）提前批次 （专科零批次）	文科	79	参照汉语言计划执行	文科	75	文科		77
文化课	155	文化课	150		文化课	155			
艺术类	本科提前批次 （本科零批次）	文科	从高分到低分适当控制分数		参照汉语言计划执行	参照汉语言计划执行	文科	从高分到低分适当控制分数	
		文化课	133 （参考分数线）	文化课			106 （参考分数线）		
	高职（专科）提前批次 （专科零批次）	文科	从高分到低分适当控制分数		参照汉语言计划执行	参照汉语言计划执行	文科	从高分到低分适当控制分数	
文化课	109 （参考分数线）	文化课	100 （参考分数线）						

注：“三校”高职批次从高分到低分，适当控制分数。

新疆招生

资料来源：<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8-06-26/doc-ihencxtu2120236.shtml>

进入21世纪后，尽管新疆和西藏开始大力推进“双语教育”，加强汉语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并用汉语讲授专业数理化等各门课程，但是南疆和藏区民族中小学的汉语师资队伍、课程讲授质量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质的提高，所以这些“双语班”学生的学习成绩和高考竞争力仍然不容乐观。从下表中也可看到，新疆理科一本的“双语班”录取分数线（376）虽然高于“民考民”（327），但是仍然低于“民考汉”的录取分数线（398）。文科一本的“双语班”录取分数线（384）也低于“民考汉”的录取分数线（421）。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的统计数字，2000年在普通学校（汉语授课）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比例为：小学（4.2%），初中（4.8%），高中（9.5%）（马戎，2012a：176）。由于近几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小学中强力推行双语教育，这一比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017年新疆少数民族小学在校生中，“双语班”和“民考汉”已占到97.85%，“民考民”只占2.15%；在少数民族初中在校生中，“双语班”和“民考汉”占87.66%，“民考民”占12.34%。大量维吾尔族学生在民族小学读书后，直接进入“双语班”或普通中学学习，学习质量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尽管如此，由于“民考民”学生在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中学生中仍占一定比例，他们的学习情况与就业前景需要我们给予特殊的关注。

二、“民考民”学生高考在学校和专业申报时面临的限制

由于在民族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语言是母语，他们通过母语文教材和课程掌握数理化生等现代科技专业知识，这就限制了“民考民”学生报考大学和具体专业时可选择学校的地理范围。他们通常只能报考本自治区、可继续用母语学习的大学（如新疆大学、西藏大学）的相关专业，即使他们报考内地大学，有可能被录取的学习专业集中在本族语言文学和历史（如蒙古语言与文学、蒙古历史）。2012年西藏“内地班”升入大学的学科结构为：管理学（21.2%）、法学（14.3%）、文学（10.8%）、经济学（10%）、教育学（1.3%）、历史学（1.3%）、哲学（0.3%），属于文科的专业占录取总数的59.2%（尼玛顿珠，2016：322）。由于各主要少数民族（维吾尔、藏、哈萨克、蒙古等）大学生在内地学习的具体学校、专业分布的结构及历史演变与这些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地点和职业选择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开展系统的调查与分析。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发展很快，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藏等少数民族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数持续增加，但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专业结构。如果把全中国近期某年度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整体专业结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等）所占比例作为参照系，那么就可以对维、哈、蒙、藏等民族获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者的专业结构与中国整体结构进行比较，看一看是否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是否存在具体的专业差异。

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多数从小在民族学校学习，通过母语教材学习数理化生专业知识，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他们在进入大学后有相当大的比例集中在文科特别是人文学科专业（语言、文学、教育、历史、民族学、哲学等），在社会学专业（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人数较少，在理工科各专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建筑、信息技术等）的人数则更少。我国大学各专业的招生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是参照每年各专业的就业需求来确定和调整的。如果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专业结构与全国大学生整体的专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则预示其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上必然会面临与岗位需求之间无法衔接的情况——即少数民族毕业生对市场需要的一些专业岗位供给不足，同时又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因专业不对口而找不到岗位。许多在本专业就业困难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最后的就业出路是报考国家统招的公务员，即使他们能够成功地进入公务员队伍，但是他们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却难以得到真正应用发挥。

如果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研究生与国家人才市场所需专业结构存在较大偏差，就会导致许多毕业生不能顺利地找到专业对口的就业岗位，不能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充分发挥出来。而当他们放弃自己所学专业而进入不对口的工作岗位后，又必须重新开展专业学习并适应工作环境。与已经具有本专业较好基础的其他毕业生相比，他们的工作调适难度更大，未来发展的空间会受到限制，很难进入该专业领域的前沿。这种就业状况对我国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国家现代化发展和学术创新的程度无疑会产生负面作用，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职业自信，从长远看，这对于提高我国少数民族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汉语是我国学习现代科技与学术知识体系的工具语言

1905年清朝正式“废科举，兴新学”，随后我国参照欧美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起一套从小学、中学、大学、专科到研究生的现代教育体系，在各级学校里建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教育、法律、医学、农学、工程、建筑等一整套专业课程体系，西方国家的各科教材（或借鉴日文教材）被系统地翻译成汉文，进入我国各级学校的课堂，各师范学校陆续培养了与各专业教学相适应的教师队伍。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对欧美教材发展的不断吸收和跟进，我国现代知识体系各学科的专业汉文教材已经相当成熟，并经过历代师承教学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专业

课程教师队伍。我国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多次拔得头筹，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国学生出国转入欧美各国中学后的数理化科目成绩表现优异，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国以汉文授课的数理化专业教育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界公认的较好水准。

相比之下，西藏自治区在 1951 年以前没有现代小学，新疆、内蒙古等地的中小学教育与北京、上海等沿海地区相比，发展相对滞后。由于教育基础弱、知识分子和教师队伍规模小，新中国成立后西部边疆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也无法与东部汉族地区相比。而且，数理化等现代科学专业的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哈萨克文教材的质量与汉文教材的质量相比，存在十分显著的差距。笔者 2007 年在喀什第二中学调查时，一位维吾尔族中学生告诉我说：“即使想学好中学数学，也需要多看高质量的汉文教辅材料”。同时，各学科、各专业的维吾尔文、藏文、蒙古文出版物（基础教材、研究文献、西方学术经典译本）的数量和质量也与汉文出版物完全无法相比，这从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西藏大学图书馆的民族文字和汉文出版物的比较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马戎，2012b：148-149）。当代稍有影响的外文出版物，不需几年即有汉译本出版，这是由一个超过 12 亿庞大汉文读者群体所支撑起来的翻译和出版市场，它是我国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出版业所无法相比的。随着国际学术与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可以预期，今后这一差距还可能越拉越大。考虑到我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目前的基础与“投入-产出”的效益考量，今后需要在一个什么程度上发展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藏文等语言文字的数理化课程教材，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考虑到以上发展趋势，为了使我国各少数民族的青少年能够提高数理化等现代知识的学习成绩和高考竞争力，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思路是今后我国民族中小学的数理化等专业课程逐步转用汉文教材。少数民族学生通过学习高质量的汉文专业教材，提高数理化等科目的考试成绩，从而得以有更多的人进入国内一流综合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习，并为他们毕业后进入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和研究部门工作创造条件。根据《2008 年两院院士调查报告》，2008 年我国共有两院院士 1855 人，其中汉族为 1821 人（占 98.17%），满族 18 人（0.97%），蒙古族 5 人（0.27%），另有回族 4 人，土家族 3 人，壮族、白族、藏族、畲族各 1 人¹。满族、回族、土家族、壮族的通用语言是汉语，蒙古族人口中有很大比例通晓汉语，由此可见，熟练掌握汉语对我国少数民族青少年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条件。在我国目前的各综合大学和一流研究机构中，汉语是主要的国内交流工具性语言，英语则是对外交流和阅读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主要国际工具性语言。

四、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的继承与发展

近些年来，五省藏区和新疆的民族中小学在大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学习和双语教育。但目前少数民族学生在现代科学科目（数理化生）的学习成绩普遍不理想，高考时只能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来保证一定的入学率，入学后难以跟上同年级汉族学生的学习进度，毕业后有许多人面临就业困难。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各地政府开始加强中小学的汉语课程，这是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应对之策，可以说是势在必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

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使用汉语教材学习数理化，与学习自己本民族母语文并不矛盾。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担心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是否会因此被削弱，这一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矛盾经常掩盖另一个矛盾。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而且，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百花园”中，少数民族语言文

¹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917/21/5615448_591

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继承和发展，政府必须为那些愿意学习和研究母语文、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各地民族中小学的母语文课程必须保留，而且质量应当逐步提高。同时，不仅各民族院校和边疆地区各大学应继续开设并加强民族语言文学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我国内地各综合大学也应当开设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这些专业的招生规模可以根据就业状况不断进行调整。同时，有条件的综合大学应当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机构，培养具有现代语言学知识和研究能力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学者，把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学者的研究兴趣局限于本民族语言文字、历史和有限的本民族文本文献，学术对话范围仅限于本民族（或国外同族）的一个较小的学者圈子。如果我国少数民族学者不去真正拓展自己的学术眼界，缺乏宽广的胸怀，不去掌握汉语和其他外语工具，无法通过汉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物来系统地吸收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现代知识体系，他们就不可能在一个更大的学术平台上与国内外高层次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不以“民族”来划定范围的，如果这样的“半封闭状态”得不到改变，即使是对本民族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水平，也不可能在学术上真正得到提高升华并走向世界。

五、我国综合大学不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带来的弊端

目前我国各综合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都设有“外国语学院”，学生们在这些学院里学习英、法、德、日、俄、西班牙等外国语言，教师们在这些学院从事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的的教学研究工作。但是，这些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并不包括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蒙古语等），我国各族学生对这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和教师们的相关研究工作都放在各民族院校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院校（如新疆大学、西藏大学）的少数民族语言专业。（请核对这一段）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我国各族学生（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学生）在大学校园里无法得到学习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机会，而熟练掌握这几种语言文字，是他们与这些民族成员开展交往交流的基本条件。我国的民族分校教育制度使汉族学生在中小学阶段不可能接触和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入大学后也没有学习的机会。这样一个教育体制在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就是今天我国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汉族学生数量几乎为零。但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疆、藏区、内蒙古牧区等）的各项工作（党政机关、文教卫生、经济生产、贸易和服务业、通信交通等）都需要大量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人员如果不能熟练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就无法直接与当地干部和民众进行交流合作，对于这些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

有些少数民族大学生希望在学校课程中系统学习与本族语言相同或相近的外语，只能进入综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学习，如北京大学的蒙古族学生在外国语学院东语系开设的蒙古语课程学习蒙古国语言文字（西里尔文字），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哈萨克族学生在本校的哈萨克语专业学习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语（西里尔文字）。相关课程的学习材料中有大量该国学者撰写的有关民族历史和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史诗歌曲、人物传记、影视作品，含有强烈的民族情感，非常容易唤起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对该国的文化认同甚至政治认同。由于我国现行的民族理论教科书把国内56个群体都称作“民族”，这一定义与国际上通用的“民族”（nation）定义虽有区别，但容易混同，很容易建立国内蒙古族学生与蒙古国之间、国内哈萨克族学生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民族认同”。这种情况对于在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心中构建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如果我国各综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转型为“语言学院”，开设少数民族语言课程（蒙古语）和相近的外国语言（蒙古国蒙古语）课程，学生可以在比较中更加清楚地认识两种

语言之间的重大差异。如蒙古国蒙古语使用西里尔文字，包含大量俄语词汇，而我国蒙古语使用传统文字，包含大量汉语词汇，历史上同源的这两种语言已经在各自近百年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发生了方向不同的演变。

六、综合大学开设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课程的积极后果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对国内综合大学的部分体制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把现有的“外国语学院”改为“语言学院”，（此处删去一句）把我国主要少数民族语言（维、哈、藏、蒙、朝）纳入专业课程体系，为我国汉族学生和各族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机会。这一体制调整可以在几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可以在综合大学里愿意学习这些语言的汉族学生提供正规和系统的语言学习机会，使他们对我国“多元一体”的基本国情和民族格局有更为具体和更为全面真实的了解，同时为他们学成后的就业开拓更为广泛的前景。例如：来自甘肃、四川农村的汉族大学生如果掌握了维吾尔语、藏语，他们就会成为南疆和藏区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有着光明的就业前景，对于他们的就业和发展而言，学习维吾尔语和藏语也许远比学习英语和日语更具有实用价值。

（2）这些语言专业和课程的系统开设，将明显增加各综合大学教师队伍的少数民族教师的数量和比例。据了解，北京大学长期没有一名维吾尔族教师，只有一名藏族教师（讲授梵文）和一名哈萨克族行政人员，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我国各民族院校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百花园”。应当把全国各综合大学也逐步变成“各族师生的百花园”，为青年一代的族际交流和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个必要的客观环境。美国大学非常重视种族和族群成分的“校园多样性”（campus diversity），非常注意聘请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教师员工和招收少数族裔学生，努力创建一个多族群深层次交往交流的校园环境。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3）综合大学开设少数民族语言专业课程，可以让我国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在一个“多民族大家庭”的校园氛围内成长。目前，我国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等少数民族学生多集中在各民族院校，而且还相对集中在本民族语言文学的各专业，这些学生与本校其他院系的汉族学生交往很少，客观上形成了以各“少数民族语言院系”为单元的“民族区隔”，十分不利于各族学生之间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交往交流。

（4）综合大学开设少数民族语言专业课程，可以让来我国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各国留学人员在综合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校园环境中，与汉族学生一起学习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同时也有机会更多地接触汉族师生和中原文化。这将有助于他们把维族文化、藏族文化等看作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与汉族文化完全区隔开的“另一种文明”，这对于他们在心目中接受“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必然有帮助。这些外国留学人员可以和广大汉族师生们一起学习、研究维吾尔族、藏族等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研究各民族共享的中国社会现代变迁与发展。

（5）在各综合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读的汉族学生一般学习成绩比较好，与各民族院校就读的汉族学生相比，具有较强的学习自制能力和学术研究潜力，他们会激励和带动同校少数民族大学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这些优秀的汉族学生如果有兴趣学习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毕业后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或进入相应研究机构，他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将有助于推进和提高我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和历史演变的研究工作。

（6）目前关注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发展的汉族学者为数不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因此无论是研究历史文献还是开展实地田野调查都有一些障碍。而研究民族问题的少数民族学者虽然可以直接阅读少数民族文字史料，但是由于汉语是他们的第二

语言，在中小学甚至大学期间阅读的汉文文献（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经典）数量和层次都十分有限，缺乏学术积累，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和分析能力。目前国际学术界的许多重要文献都只有汉译本，今后这一局面恐怕也不可能改变，因此有限的阅读基础必然限制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知识积累和研究创新能力。综合大学毕业的汉族学生和民族院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两部分人各有不足之处，两方面的缺憾并列在一起，在客观上影响了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对话能力，这一局面对中国在“民族-族群”等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非常不利。

例如，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推动的“新清史”研究在国际和中国学术界之所以能够引起超常的反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内的清史研究，主要原因即在于我国汉族学者中熟练掌握满文、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的人极少，长期以来他们的清史研究主要依靠汉文文献；同时，我国少数民族学者的学科基础和理论素养有限，很难介入到重大议题的深层次学术讨论，这两方面缺憾的并存造成我国学界在应对“新清史”研究中的被动局面。推出“新清史”研究思潮的外国学者很容易根据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质疑从汉文文献得出的观点，而少数民族学者也很容易被外国学者牵着鼻子走。这样的被动局面必须打破。因此，调整我国综合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为“语言学院”（此处删去几个字），为汉族学生和外国留学生开设维吾尔语、藏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课程，是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并争取在未来彻底改变我国民族研究现状、拥有更多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一个重要举措。

七、关注我国少数民族留学生的学习与就业

近些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学生出国留学的人数增长很快，在全国出国留学人员中所占比例也不断增加。但是对这些在海外的少数民族留学生的具体学习专业分布（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等）、所获学位结构（本科、硕士、博士）以及获得学位后的就业地点（回国在本民族地区工作、回国在东部城市工作、在留学国家就业、转到其他国家就业）和就业状况（高校任教、企业就职、个人创业等各种类型，以及是否从事所学专业性工作等）的调查研究却很少。

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来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留学生在境外所学专业 and 就业状况，关心他们的学业和成长，掌握其发展态势，并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及时提供帮助。教育部、公安部、我国驻外使领馆都有责任在申请手续、学习、医疗、就业、法律咨询等方面积极帮助境外的我国少数民族留学生。为了吸引留学国外的少数民族留学生学成后归国服务和发展，上述机构还应向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支持，并在国内相关的人才政策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

八、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在内地就业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发展方面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因此过去的口号是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应回去建设家乡，“改变家乡面貌”。许多学生返回家乡后，发挥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确实在许多方面对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教育部对新疆“内高班”的就业政策是“鼓励回新疆，允许留内地”。有调查显示，天津一些学校“内高班”学生大学毕业后返回新疆就业的比例高达76%（欧登草娃，2016：154）。“内高班”学生的高考招生工作由教育部单独制定计划，参加就读学校所在省市的统一高考，由于各省市的考试难度和录取分数线存在差距，“内高班”学生在教育发达省市的实际学习能力和掌握的知识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在录取时也会受到所在省市较高录取线的影响而失去进入更好大学的机会（欧登草娃，2016：190-197）。

近些年，西藏“内地班”和新疆“内高班”学生在内地完成高中学习后，绝大部分顺利考入内地大学学习。但据了解，这些进入内地大学就读的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大学生的所学专业（如船舶设计制造、海洋生物学）不一定适合回到藏区或新疆就业。有些一心想回西藏就业的西藏籍大学生在校并没有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而是积极准备回到西藏报考公务员。同时所在学校也不希望这些藏族学生留级或肄业，因此多采取降低要求的做法以保障这些学生顺利毕业。这实际上使得学生本人的宝贵学习光阴、所在大学的教育资源、政府提供的各项补助等被白白浪费，这种局面应尽可能避免。如果换一个思路，我们转而鼓励那些在大学所学专业并不适宜返乡就业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毕业后留在内地专业对口的岗位就业，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此外，这些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留在内地城市就业和居住，不仅可以使这些学生所学专业知识发挥作用，同时对于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可起到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样的就业策略实际上拓展了藏族、维吾尔族学生入学时的专业选择范围，有助于改善藏族、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新一代知识分子就业领域的整体结构，增加少数民族在各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与此同时，这样的就业思路可以逐步改变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就业地点分布，有利于扩展我国藏族、维吾尔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居住分布范围，促进我国各民族人口的跨地域均匀分布。少数民族青年的专业结构均布和职业行业均布是各民族人口地理均布的重要条件。

结语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国 56 个民族和 13 亿国民都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历史上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现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全面参与祖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从而掌握现代知识体系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大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国家精英，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就业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参考书目：

- 马戎，2012a，《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 马戎，2012b，“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10 卷第 3 期，第 136-156 页。
- 马戎，2013，“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 尼玛顿珠，2016，“多元文化教育视角下的内地西藏班”，马戎主编，《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 290-344 页。
- 欧登草娃，2016，“他们如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马戎主编，《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 149-166 页。

【论 文】

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

以天祝县为例¹

王浩宇²

摘要: 在民族语言使用衰微地区, 少数民族内部存在一种特殊的分层现象。天祝藏族自治县的个案研究表明, 语言习得与使用能力的差异维系并再生产了一种社会结构。对于缺乏优质语言教育资源的少数民族个体而言, 在升学和择业过程中不具优势, 致使其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当前, 加大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积极发挥语言在脱贫攻坚中的“造血”功能, 是促进少数民族全面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的基础性条件。充分挖掘民族语言的社会经济价值、营造少数民族青少年积极学习本族语的氛围, 也是语言扶贫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 语言能力; 教育分化; 社会经济地位; 民族语言; 国家通用语

语言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工具。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及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 个体的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等已联系得更为紧密。在广大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背景下, 解决好语言问题不仅是推动少数民族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 同时也是扶智和扶志的有效工具, 对推动各少数民族群体实现共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为例, 结合当地语言环境, 从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经济收入、职业发展等视角呈现藏族青年一代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并借此讨论加强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和保护民族语言的发展对于全面提升个人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的重大意义。

一、天祝县藏族语言使用情况

天祝县位于甘肃省武威地区南部,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 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天祝县现有藏族、汉族、土族、回族、蒙古族等 22 个民族, 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流、交融的典型区域。语言转用和语言兼用是近些年天祝县社会变迁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从语言使用能力来看, 无论是生活在县城的藏族居民, 还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牧民, 大多数都能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社会交际; 但已有部分藏族受访者不会藏语或藏语使用不熟练(具体数据见表 1)。从语言使用的范围和频率来看, 藏语在天祝县使用范围较小、使用频率较低; 国家通用语使用范围广, 使用频率较高。在当地整体语言环境中, 国家通用语是强势语言³, 藏语仅在寺院、牧区的藏族家庭等特殊语域中被经常使用。

¹ 本文刊载于《语言战略研究》2019 年第 1 期。

²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

³ 戴庆厦曾指出, 使用“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的名称, 是为了区分语言功能的大小, 这是属于语言社会学的概念, 与语言结构特点的差异无关, 因而丝毫不含有轻视弱势语言的意味。不同语言的内部结构, 各有自己的特点, 也各有自己的演变规律, 这是由各自语言机制系统的特点决定的, 不存在“弱势”和“强势”的差异。

表1、不同时期天祝县牧民语言使用能力对比¹

语言	时间	懂 (%)	略懂 (%)	不懂 (%)	合计 (%)
藏语	1988 年	100	0	0	100
	2015 年	64.2	24.5	11.3	100
国家通用语	1988 年	59.3	29.6	11.1	100
	2015 年	94.3	5.7	0	100

语言态度是影响语言使用的重要因素。从使用价值来看，多数天祝藏族受访者认为在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国家通用语的使用价值更高，而藏语则在节庆活动、传统仪式方面具有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语言威望评价来看，多数受访者认为藏语更具威望。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人群主要由藏族中老年构成，已有相当数量的藏族青少年认为使用国家通用语会“显得更有身份”。从情感价值来看，大多数藏族成员依然具有较强的“母语情结”，并对当前的语言转用现象感到惋惜和遗憾。不过，也有一些藏族受访者对语言转用持支持态度，认为学习与使用国家通用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调查数据见表 2。

表 2、天祝县藏族居民语言态度调查²

语言	使用价值评价	威望评价	情感价值评价
藏语 (%)	22.4	52.8	66.3
国家通用语 (%)	70.7	38.6	32.3
其他 (%)	6.9	8.6	1.4
合计 (%)	100	100	100

注：“其他”包括“说不清”、土语、英语等。

另外，与其他民族地区类似，天祝县藏族的语言使用也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现象。整体而言，人口流动、族际通婚、民族交融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强化当地藏族转用或兼用国家通用语。未来，藏语在天祝县的传承与发展将面临诸多考验，在语言使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如何维系多语并存并用的发展局面是需要人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

二、语言教育分化与家庭背景的结构性差异

当前，语言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天祝县藏族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比起本族语，当地大多数藏族青年更加倾向于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使用。虽然藏族成员非常支持本民族语言的发展，但受到升学、就业等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多数人首先认为学好国家通用语才是未来实现向上流动的基础性条件。

(一) 天祝县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³藏族学生生源情况对比

天祝县民族中学在校学生总数 523 人，少数民族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99%（主要为藏族），

¹ 表 1 中 1998 年调查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的科研人员于 1986-1988 年期间对当时全国 5 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113 个自治县（旗）和 15 个少数民族居住的省所进行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其中天祝县所选调查点为“牧区”，调查对象为“牧民”，样本量不详。2015 年数据源于笔者年在天祝县的田野工作，田野点分别为：西大滩乡、天堂乡、抓喜秀龙乡，调查对象为当地的藏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收集数据（主要参考年龄因素进行分层），有效样本量 N=466。本文选择天祝县抓喜秀龙乡（天祝县藏族聚居区之一，当地最大的牧区）的语言数据（N=97）与 1988 年数据进行比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指标设置与抽样方式的不同，这一资料对比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误差。参见王浩宇、何俊芳，“天祝县藏族居民语言使用现状调查与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 年第 5 期。

² 表 2 中语言态度调查有效样本量 N=369，由于抓喜秀龙乡属于牧区，语言使用情况较为特殊，故关于语言态度的分析仅采用西大滩乡和天堂乡的调查数据。数据采集方式与表 1 数据一致。其中，语言使用价值评价、语言威望评价、语言情感价值评价的测量问题分别为“在日常生活中，哪种语言对你来说最有用”，“使用哪种语言让你感觉自己最有身份”，“平时听到哪种语言让你感到最亲切”。

³ 天祝一中是当地教育质量最好的普通中学。

教学方式主要以国家通用语授课为主，加授藏语文和英语。研究人员从民族中学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抽取了部分藏族学生，与天祝一中藏族学生的家庭情况进行对比。¹

1、生源地

民族中学多数被调查的藏族学生来自天祝县牧区，还有的来自于农区，生源地为天祝县县城的学生数量极少，与天祝一中形成鲜明对比。民族中学受访者共 88 人，家庭住址为牧区、农区和县城的分别有 78 人、7 人和 3 人；天祝一中受访者共 38 人，家庭住址为牧区、农区和县城的分别有 1 人、9 人和 28 人。

2. 父亲职业

从被调查学生父亲的职业来看，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两所学校的情况也有较大的差异。在 88 名民族中学的受访者中，父亲职业为牧民、农民以及从事运输、建筑、餐饮等行业的务工人员分别有 49 人、16 人和 19 人，个体户和公务员各 2 人；在 38 名天祝一中的受访者中，父亲职业为牧民、农民以及务工人员 and 从事运输、建筑、餐饮等行业的务工人员仅有 1 人、6 人和 8 人，剩余分别为公务员 10 人、教师 5 人、医生 2 人、个体户 6 人。

(二) 天祝藏族学生教育模式的类型分析

从民族中学藏族学生的教育背景来看，其升学模式普遍具有相似性。在小学阶段，牧区或者农区的藏族学生就读于当地的双语小学，毕业之后大部分学生进入县城的民族中学读书，包括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牧区双语小学的藏族学生考入天祝一中的难度较高，仅有极个别学生能够依靠特殊关系进入天祝一中或天祝二中等普通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绝大多数学生升入民族中学的高中部。结合相关调查资料，可以将民族中学和天祝一中藏族学生的教育模式划分为 3 种类型。

1. 教育分化的 3 类模式

场域和惯习与文化资本的获得和积累密切相关。场域界定社会背景的结构，而惯习则是在这一背景中进行运作的。惯习首先是一种组织化行为的结构，同时也是一种习惯性的状态，其来自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外在的结构被此种经验所内化 (Bourdieu, 1977a)。同一阶层的个体在惯习上具有结构上的“亲和性”，表现为实践活动的一致或相似。惯习一方面限定了行为的方式或倾向，另一方面也产生出与早期社会化特征对应的洞察力、抱负以及实践 (Swartz, 1977)。借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分析，天祝县牧区的藏族学生受到惯习和场域的影响，其父母所处社会阶层、生长地域及家庭收入等都会对文化资本的获取产生影响。而文化资本的存在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文化界限，下层社会的个体缺少上层社会所拥有的教育资本，从而促使下层社会的个体在特定场域中进一步强化其固有的惯习特征 (Bourdieu, 1977b)。语言作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与个人的教育和成长轨迹密切相关，并由此再生产出一种结构性的关系。天祝县藏族学生教育分化具体模式见表 3)。

表 3、天祝县藏族学生教育分化模式

类型	I 类	II 类	III 类
生活地域	县城	部分乡镇或农区	牧区或部分农区
父亲职业	公务员、教师、医生等	村干部、个体户等	牧民、农民
就读中学	天祝一中、天祝二中	天祝二中、新华中学	民族中学
就读大学	重点或二本院校	专科学校或二本院校	专科院校或没读大学 (高中毕业或辍学)
个人发展	上升渠道多元化	上升渠道较为单一	外出打工、本地待业

注：该表格只做类型学上的划分以说明相关问题，并不适用于所有个案。

¹ 民族中学样本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在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各抽取一个班级而获得；由于天祝一中藏族学生数量较少，样本通过偶遇抽样、滚雪球抽样，以及学校教师推荐访谈等方式而获得。

关于天祝县牧区藏族学生的升学问题，一位藏族家长在受访过程中是这样描述的：

民中学生的家长都是牧民，他过去也不懂，就知道娃娃要学藏语，学好藏语将来升学不费劲。现在很多家长也知道了，要学好汉语¹才好找工作，出去以后都是汉语，天祝这地方也是一样。但是牧民家的孩子也考不上（天祝）一中，娃娃藏语学出来，只能去上民中。（受访者：男，藏族，48岁）

2. 近年来民族中学学生、教师数量及重点院校录取率变化情况

伴随着天祝县语言环境的变化，近些年民族中学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导致优秀教师的离职及教育质量的下滑：

过去我们在乡上（访谈人来自抓喜秀龙乡），给民中输送（学生）的时候，全县（第）一、（第）二名的学生都有，现在“民考汉”干脆一个（都）考不上，“民考民”也不行，考藏文（“民考民”）连500分的学生都没有，他（们）的数学、汉语各方面都不行。学校发展不好，好的老师都走了。（受访者：男，藏族，51岁）

实际上，自2010年起，民族中学的学生与教师数量就已经开始减少，重点院校的录取率也基本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具体数据见表4。

表4、民族中学学生数量、教师数量与重点院校录取率

时间（年）	学生数量（人）	教师数量（人）	重点院校录取率（%）
2010	1030	141	0
2011	802	140	0
2012	740	139	2.3
2013	647	135	0.5
2014	591	130	1.0
2015	532	129	0
2016	523	126	0.4

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天祝藏区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早，语言环境和人们的教育观念随之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追求语言工具价值的倾向也已成为影响人们思考语言使用与传承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部分藏族学生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家通用语的学习上，主要是因为社会就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基于未来的个人发展与社会流动而做出的考量：

天祝这个地方和兰州、武威这些城市接近，很早这个地方的高速就通了，那我们看到人家的孩子都考清华和北大，我们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念呀，那怎么办，考这些学校要学英语的，那就去上普通高中。现在都一个娃娃，娃娃学（藏语）出来没办法，民中也不是一朝一夕变成这个样子的。（受访者：男，藏族，36岁）

三、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分层

语言能力不仅在语言交换中养成，也依靠学校教育的培养。掌握不同经济资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也产生出不同的语言能力（高宣扬，2005: 304）。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职业声望、社会资本的获取等密切相关，是考察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

（一）民族中学藏族学生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

对于民族中学的藏族学生而言，其国家通用语和英语水平不及普通中学的汉族学生和藏族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语言优势；多年的藏语学习效果似乎也并不理想，藏语使用能力较差，

¹ 马戎等国内学者提出，“汉语”一词的提法并不准确，容易引起误读，建议使用“国家通用语”之称。

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藏族学生的语言态度。

1. 语言能力

研究人员在民族中学高中部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调查校内藏族学生关于国家通用语和藏语的使用能力，见表 5。

表 5、民族中学藏族学生语言使用能力 (N=260)

语言	能熟练交谈 (%)	能交谈, 不熟练 (%)	能听懂, 但不会说 (%)	听不懂 (%)
藏语	11.1	17.7	66.1	5.1
国家通用语	96.9	2.3	0.8	0

表 5 样本数据显示, 几乎所有的藏族学生都能比较熟练地使用国家通用语, 但能够熟练使用藏语的人数仅占样本量的 11.1%, 大多数藏族学生属于“会听不会说”的类型。调查发现, 藏族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基本使用国家通用语进行交流, 部分声称自己“会藏语”的学生在交际中仅能讲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2. 语言态度

语言是一种集体化的公共产品, 为人们提供沟通的渠道, 因而其生命在于使用。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 选择一种标准、网络或语言就是一种投资, 一种语言越有价值, 它的寿命就越长, 它的使用者就越多 (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 102)。所以, 语言与其他大多数商品所表现出的“物以稀为贵”的价值特性不同——“网络效应”促使语言的工具体价值随着使用人数、规模、范围等增多或增大而不断获得提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民族中学藏族学生的语言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见表 6。

表 6、民族中学藏族学生语言态度 (N=260)

语言 比例 (%)	在日常生活中, 哪种语言对你来说最有用?			
	藏语	国家通用语	英语	其他
	36.9	54.6	5.4	3.1

表 6 数据显示, 民族中学仅有 36.9% 的藏族学生认同本族语的使用价值。实际上, 调查数据并没有客观反映当前藏族学生真实的语言态度。由于藏语在当地社会的使用范围小、使用频率低, 加之媒体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 部分学生对藏语学习持排斥态度。从整体上看, 民族中学藏族学生对本族语的使用能力不强, 转用国家通用语趋势明显, 其语言态度不利于藏语的习得和传承。

(二) 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藏族毕业生社会经济分层的个案呈现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资本, 在现代社会中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因而文化资本的差异能够影响社会经济的分层体系。教育分化及其语言教育资源的配置差异, 导致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藏族学生的语言使用能力, 特别是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具有较大的差异。¹ 语言能力的差异未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藏族青年一代的职业发展、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等。

1. 个案调查情况

本研究对当地 20 位从民族中学和天祝一中毕业 5~10 年间的藏族学生进行个案调查, 主要采用实地访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 其语言能力、升学与就业、经济收入情况见表 7。

¹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天祝县藏族兼用或转用国家通用语的时间较早, 相比于其他藏区, 当地藏族青少年的国家通用语水平整体较高 (就国家通用语而言, 无论是民族中学, 还是天祝一中的藏族毕业生都声称自己具有较强的使用能力)。但是, 根据当地中学教师的介绍, 实际上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的语文教学质量差距较大, 两校之间藏族学生的语文成绩, 特别是写作能力与口语表达能力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表 7、天祝县民族中学与天祝一中毕业生个案调查

编号	国家通用语/藏语水平	毕业学校	职业	年收入	备注
1	一般/弱	民族中学	个体户	约 5 万	在天祝县天堂寺附近开小卖铺
2	强/弱	民族中学	教师	约 5 万	天祝县西大滩乡小学
3	强/强	民族中学	学生	无	澳大利亚药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4	强/弱	民族中学	文员	不详	在天祝县县城某打印店工作
5	强/一般	民族中学	公务员	约 6 万	天祝县县政府
6	强/强	民族中学	教师	约 10 万	成都市某高校
7	强/强	民族中学	编辑	约 12 万	拉萨某出版社
8	一般/弱	民族中学	待业	无	在天祝县西大滩乡家中待业
9	一般/弱	民族中学	保安	约 2 万	天祝县某小区
10	强/弱	民族中学	服务员	约 3 万	武威市某火锅店
11	一般/弱	民族中学	文员	约 3 万	天祝县某传媒公司
12	强/一般	民族中学	技术员	约 5 万	武威市电视台
13	一般/弱	民族中学	司机	约 5 万	长途车司机
14	一般/一般	民族中学	个体户	约 4 万	在天堂寺附近经营小旅馆
15	强/不会	天祝一中	歌手	不详	主要在青海、甘肃等地表演
16	强/不会	天祝一中	创业	不详	在兰州从事药材生意
17	强/弱	天祝一中	学生	无	武汉某高校在读博士生
18	强/不会	天祝一中	公务员	不详	广州市某区政府
19	强/弱	天祝一中	教师	约 10 万	在兰州市从事音乐培训工作
20	强/强	天祝一中	公务员	约 10 万	上海市某政府机关

2. 个案信息呈现

表 7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语言使用能力、教育背景的差异与职业地位、经济收入等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多数天祝一中毕业的藏族学生在省会城市就业，平均年收入与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多数民族中学毕业的藏族学生在天祝县或中小城市工作，平均年收入与职业地位相对较低。在天祝县藏族群体内部，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拥有更好的教育条件，从而获得良好的语言能力（这里主要指国家通用语的使用能力），甚至是获得更强的学习自信，进而在未来的职业选择和经济收入方面更具优势。

值得指出的是，表 7 数据还显示，3 号、6 号、7 号受访者虽然毕业于民族中学，但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相对较高，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中上层。调查得知，3 号受访者目前在澳大利亚某高校读药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藏药方面的研究；6 号、7 号受访者是姐妹关系，分别在某大学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目前从事藏族社会研究和藏语编辑工作。另外，20 号受访者在上海某政府机关工作，平日所处理的主要事务与少数民族事务关系密切。上述受访者从事的工作都与传统藏文化和藏语文密切相关，从另一角度理解，正因为具备了较强的藏语文使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三）藏族青年一代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类型分析

基于上述田野材料，可将藏族青年一代的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划分为国家通用语单语、民族语单语和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双语 3 种模式进行考察。

1. 国家通用语单语模式

由于语言是高度集体化商品，所以有可能出现这样的蜂拥现象：有些人为了获取这些商品挤进去，有些人则为了摆脱这些商品要冲出来。而当大家都蜂拥去学习一门中心语言时，其使用者越多，想要学习这门语言的人也就越多（博纳德·斯波斯基，2011:102）。受到天祝县整体语言环境的影响，与本族语相比，当地大多数藏族青年更加倾向于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使用。然而，掌握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差异与教育资源的获得密切相关，与教育相关的文化资本差异又会对社会分层的再生产发挥作用。在藏族青年内部，由于获得的语言教育资源的不同，国家通用语使

用能力强的藏族青年在升学、就业中更具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也更高；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较弱的藏族青年在升学、就业中均不占优势，社会经济地位一般或较低。

2. 民族语单语模式

除在牧区生活的个别藏族老人之外，目前天祝县并不存在藏语单语人的情况。当地藏民族成员普遍认为，拥有一定或较强的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不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准入条件，而且也是与他人交流、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就全国整体情况而言，仅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个体也无法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3. 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双语模式

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双语模式是提升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社会经济地位的最有效模式。如表 7 个案信息所示，在具备良好的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基础上，熟练或比较熟练使用本族语也是促使少数民族青年能够在科学研究、文艺文化、行政管理等领域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在语言使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民族语言所能发挥的也不仅是基本的身份认同功能，同时还伴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另外，在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旅游开发和特色产业升级的背景下，民族语言发展的“长尾效应”值得人们关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语言作为一种任何人都有机会使用、存量却不会减少的社会财富，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基础性要素；另一方面，部分藏族青少年对于民族语言的忽视，也可能使其失去获得民族语言本身能够带来的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机会。

四、结语

在布迪厄看来，教育体系通过自己本身逻辑的简单运作就能确保永久的特权（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 2008：94）天祝县的个案研究表明，藏族青年一代的家庭背景与教育背景的差异对其语言能力强弱的影响较大，而语言能力本身又在某种程度上维系与再生产了一种社会分层。语言知识和技能具有“元知识”“元技能”的属性，是个体获得其他知识和技能的重要基础，对大部分知识和技能，个体都必须通过其所掌握的语言技能来获得（王海兰 2018）。藏族精英家庭的子女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能够获得优质的语言教育资源，从而在就业环境中更具优势；但普通牧民家庭的子女由于无法获得优质的语言教育资源，致使其在未来的升学就业、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等方面均不占优势。

加大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促进少数民族青年一代学好国家通用语，是推动其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础性条件。即使在保护多元文化的社会体系中，少数民族实现社会流动仍然需要学习某种强势语言（Bourhis, 2001：36）。今天的汉语文作为中国国家通用语已经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马戎，2016）。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是提升个人素质、增强竞争力、全面参与现代化进程的语言基础。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而言，获取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所需的教育权利，特别是优势语言的教育权利，也是基于能在广大社会中获得机会并主动参与的需要（詹姆斯·托尔夫森，2014：68~70）。在当前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帮助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获得良好的国家通用语使用能力更是推动脱贫攻坚从“输血”走向“造血”之路的必要条件。

语言扶贫工作也要保护好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在语言工具主义看来，保持多语或双语是重要的，特别需要重视强势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的经济价值（詹姆斯·托尔夫森，2014：175）。从事实上看，民族语言能够为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增强其在创新创业、组织管理，甚至是国际交流方面的能力。“双语”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个人发展具有正面影响。同时，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从语言与文化、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语言多样化程度的降低会减少我们可以汲取的知识源泉，从而降低人类的适应能力（苏·赖特，2012：214）。

当前，营造少数民族青少年积极学习本族语的氛围，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举措。

参考文献：

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宣扬 2005 《当代社会学理论（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 2008 《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第六版）》，刘少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戎 2016 《汉语的功能转型、语言学习与内地办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苏·赖特 2012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陈新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海兰 2018 《语言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第2期。

詹姆斯·托尔夫森 2014 《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第二版）》，俞玮奇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Bourdieu, P. 1977.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his, R. 2001. "Acculturation,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in J. Klatter Folmer and P. Avermaet. *Theories on Maintenance and Loss of Minority Language*. Munster: Waxmann.

Swartz, David. 1997. *Culture &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报刊文章】

中国的大西北问题

《联合早报》2019年4月9日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90409-947054>

郑永年（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近来面临全方位的国际环境变化，涵盖了经济贸易（如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国防安全（如台湾、南中国海和朝鲜）和内部稳定和安全（如新疆问题）。新疆问题尤其突出，似乎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是政府、非政府组织还是媒体），就中国政府处理新疆问题的方法提出质疑、挑战 and 挑衅。

实际上，新疆问题不止局限于新疆，而只是中国大西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疆问题自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政府不得不下大决心来控制局面和解决问题的程度了。尽管没有多少人会否认解决新疆问题的重要性，但解决问题的方式极其重要。

如何解决问题？这首先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峻局面。从问题产生和恶化的路径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式。新疆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造成这些变化有诸多根源，但如下几个是很显然的。

新疆问题的诸多根源

首先是 1980 年代实行的被人们称之为“自由化”的政策。为了纠正之前在民族地区实行的极左政策，1980 年代开始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新的宽松政策。新政策的意图是好的，主要是为了促进民族地区各方面的发展，通过发展来维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赢得民族地区的信任。不过，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马上演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一到地方，新政策往往被理解成为政府从各方面“退出”民族事务，尤其是宗教事务。在西方，“自由化”往往被理解成为在一个领域政府规制的减少，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在 1980 年代的中国，人们对此并没有深刻理解。“自由化”在一些方面被理解成为政府的“退出”，这就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尤其表现在新疆等穆斯林（回教徒）地区清真寺（回教堂）的泛滥。直到今天，这些地区清真寺的数量（就人口和清真寺数量的比例来说）远远超过中东一些穆斯林国家，包括沙特和土耳其。在清真寺建设方面，世界上很少有像新疆那样长期处于毫无规划的“自由”状态。这种没有规制的发展自然造成了混乱，但如果要重新规制起来，就必然造成巨大的反弹。（当然，这也表现在其它一些地方，例如教堂建设。）

第二，90 年代之后的市场化对民族地区的冲击。90 年代实行大开放，在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内部变化。简单地说，计划经济的解体导致了在计划经济状态下初步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的解构。现在学术圈所讨论“民族建构”，实际上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尽管这种“建构”并不是有意识的和主动的，但很多政策在实际层面起到了“民族建构”的效应。最显著的是住房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住房是国家分配的，开始出现多民族混居小区，至少在城市是这样的。医疗和教育制度（尽管是低度的）的确立也象征着国家权力深入民族地区的社会基层。

但市场经济时代来临之后，计划经济不再有效，也失去其“合法性”。这立刻导致了雏形的多民族共同体的解体。现在的民族地区，各民族趋于“分离”状态。自然的“分离”状态很容易产生各自的认同，而没有共同的认同。不仅如此，而且往往在民族之间互相敌视。在新疆地区，从前跨民族婚姻被视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今天这种婚姻被视为是对本民族的“背叛”。这就是今天的状态。

自由化也表现在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在文化教育交流方面，政府往往只出宽松的政策，但缺少足够的财政金融的支持，因此学者和学生“走出去”之后，就自由地寻找支持的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很自然地就到了那些能够提供给他们资金的国家。沙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疆瓦哈比主义盛行和这种“走出去”密切相关。一些学者和学生在沙特等地接受了激进思想之后，自己激进化，也教育和鼓励其他人激进化。他们回到新疆之后，往往成为激进思想的“启蒙者”和传播者。

第三，巨大的内部变化更表现在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变化。此前，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口，在新疆主要是通过新疆建设兵团制度。一国之内的人口流动纯属自然，既要容许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汉族地区，也要容许汉族人口流动到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流动，那么显然就是民族“隔离”政策。这种人口流动在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前提。

但今天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族人口大量减少，汉族在新疆已经成为少数民族。这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一、少数民族地区不平等的人口政策，即汉族只能生一个，而少数民族则可以多生；二、大量汉族人口离开新疆，尤其是建设兵团的后代，大多子女离开新疆，返回内地就业和生活；三、民族地区环境的恶化，阻碍着新的人口的进入。今天，除了一些到民族地区经商的少数人，很少有人愿意居住在民族地区。

第四，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强化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认同。非常荒唐但又合符逻辑的一件事情是，那些本来没有“民族建构”的政策（例如上述住房分配政策、医疗和教育）导致了实际层

面的“民族建构”，但那些意在“民族建构”的政策反而走向了反面，即导致了民族的“分隔”。在逻辑层面，这也很容易理解：凡是具有普适性的政策导致融合，凡是具有特殊性的政策导致分隔。最主要表现在民族鉴定政策和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上。

中共早期接受了斯大林的“激进”民族定义，进行民族识别，最终在初步识别的 200 多个民族中鉴定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 55 个少数民族。在民族鉴定之后，政府又对少数民族实行远较汉族优惠的民族政策，体现在各个方面。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自然会导向民族的分化，不同的认同就是其中一类“分化”。

不平等的政策也使得民族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从高级官员到普通地方民警，大家谁也不敢正视和处理民族问题，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演变成国家层面的政治大问题。这有点类似盛行于西方的“政治上正确”。地方执行层如此不负责任，往往导致民族地方的“放任自由”，很多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累积起来，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

第五，整个西北地区的“泛穆斯林主义”。新疆、宁夏和甘肃等省是中国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尽管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不同、问题的根源不同，但都表现出“泛穆斯林化”。泛穆斯林化主要由三种力量推动。一是外部全球化，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的泛穆斯林主义的一部分。近 20 年来，穆斯林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大发展。在信息化时代，中国也被深度整合进全球穆斯林化进程之中。其二是内部政治驱动力。

在泛穆斯林主义时代，穆斯林人口的宗教认同得到了强化，甚至转变成为政治认同。无论是宗教认同本身还是基于宗教之上的政治认同，都会和世俗政治认同发生矛盾和冲突。其三是市场驱动力。这些年，中国的清真食品满天飞。尽管从商业利益的观点看，无可非议，但这种商业行为（加之社交媒体）也有效建构和传播着穆斯林认同。这不仅表现在一般社会商业层面，也表现在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甚至政府单位。

第六，“一带”所带来的新风险。从秦始皇到明代，中国的长城文化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长城文化”被视为是保守封闭，但现在看来需要对之重新思考。总体上说，“长城文化”是一种防御政策，意图把中国不能消化的“邪恶”力量挡在国门外。很简单，无论从宗教、民族、地缘等几乎所有因素来看，中国很难消化西边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在西边实行开放政策。现在的“一带”也在有效促成西边的大开放。尽管在国家议程意义上西边的开放非常重要，但也必然对大西北民族产生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边几种力量此消彼长，但一旦这些力量融合起来，就会造成巨大的能量，使得中国难以抵御。

这些力量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势力。一、内部的东突运动。这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越来越甚。二、中东局势的影响。中东从来就是一个乱局，现在随着美国势力的消减，这个地区正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失败国家越来越多。三、土耳其“帝国梦”的努力。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失败或者“北约”整合土耳其的失败，正在促成土耳其本身的“帝国梦”。尽管现在的土耳其政府为了“方便”，和中国比较友好，但这种“友好”显然没有多大的社会基础。从社会基础面来说，中国和土耳其的冲突不可避免。四、美国西方的影响。近代的西方和今天的美国一直把中亚视为其地缘政治的核心利益。一旦西方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必然会把重点置于中国的大西北。五、俄罗斯的影响。中东和中亚一直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俄罗斯和中国双边关系良好，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被遏制下去，但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够永恒。从历史经验看，俄罗斯随时都会把重点置于这个区域，从而和中国发生冲突。无论怎样，一旦这些外在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对内部的东突运动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中国应付复杂局面的方式

中国应当如何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西方今天在新疆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自然有其不同的议程在背后。不过，中国简单的反击其实也极其无效。例如，中国说西方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但这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双重标准”是“人性”使然。相反，中国可以根据西方提出来的问题，反思如何把新疆和大西北治理得更好。在新疆和大西北，必须把发展和反恐区别开来。

恐怖主义自然要影响发展，但必须把发展和反恐两者分离开来处理。因为反恐的需要，中国需要对少数极端分子进行管治，西方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对其他人员（尤其是那些问题不严重的成员）需要采用其他办法。工作技术培训极其正常，帮助人们学习语言或者技术是为了个人发展，尤其是就业。但对恐怖分子和需要工作培训的这两类人，绝对不可混合在一起。这里的问题不是做不做，而是如何做的。在新疆和大西北问题上，需要更为专业化的政策。

政府需要尽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平等的政策。在民族地区，所有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宗教事务上，应当尽快建立规制型政府，以便从现在的政治管治转型到法治。这方面，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名义上有宗教自由，但在具体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制。新加坡处理得更好。甚至中东国家本身如何规范清真寺的建设也是可以学的。

在融合政策方面，政府需要减少凸显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即优惠政策），而大大强化具有普适性的社会政策，即有利于“人人平等”的政策。社会政策最主要包括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和就业等。这些普适性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民族的融合。

在对外方面，重新思考“长城文化”。“长城文化”体现的是大西北的防御性。尽管西北的开放势在必行，但需要完全摧毁“长城文化”吗？如果这样，替代的防御机制又是什么？如何防止中东激进力量的大规模进入？如何防止上述诸种地缘政治力量聚合起来对大西北构成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推动“一带”宜以在商言商为原则，如同古代，“长城文化”并没有妨碍“丝绸之路”的进行。

不管怎么说，大西北是中国半壁江山。西北的问题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大问题。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公众号，欢迎加入并转发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84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